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在人文研究之應用： 以日治臺灣初等學校教師及其跨境為中心*

王麗蕉**

摘要

本文旨在以「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數位內容資訊，探析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小學校、國民學校之初等教師人力發展與跨境移動。以數位系統所收錄由官方每年編印之職員名錄，自 1896 年至 1944 年間，近 50 年、95 萬筆數位內容資訊，觀察初等學校教育體制與教師人事實態之全面性圖像與長期性變化。進而，實證剖析數位內容加值與資訊分析工具，對深化人文研究應用的可行模式。

本文在內容架構上，先探討日治時期教育體制與教育史相關研究成果；其次闡述《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編印發行之經緯與所刊載名錄資訊特色，以及職員錄系統數位內容加值與研究資料補正之過程，解釋史料來源產生脈絡和數位內容資訊價值；最後，擷取自 1906 年至 1942 年間職員錄數位資料集，先整體分析初等學校設置與教師人數、初等學校教師佔公職人力的比重與變化、以及教師資格與出身地等全面性師資結構，再分別探究日籍人士來臺擔任初等教師在公職比例和各都道府縣的差異，以及臺籍教師歷年人數與比例變化，和自 1921 年至 1942 年間各州廳臺籍教師人力分布及其跨境移動任教的實態。

關鍵詞：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初等學校教育、日治時期、人文資訊學

* 本文初稿曾以〈探析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在日治初等教育史研究之應用〉為題，發表在 2016 年 11 月 29-30 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主辦之「數位典藏與校史經營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承蒙與談人薛理桂教授提出許多精闢資訊處理專業意見，和本刊二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的修改建議，以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謝明如、陳致榮與林佑芯等同仁，協助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相關資料蒐集，和數位系統名錄資料處理與內容校對，使本文研究資料更為縝密周延，特此謹致謝忱。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副技師兼檔案館主任

來稿日期：2020 年 7 月 16 日；通過刊登：2020 年 9 月 18 日。

- 一、前言
 - 二、相關史料與研究回顧
 - 三、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編印與數位系統加值建置
 - 四、臺灣初等學校教師人力發展：1906-1942
 - 五、日籍教師人力發展及其跨境比較
 - 六、臺籍教師人力發展及其跨境流動
 - 七、結論
-

一、前言

臺灣推動資訊科技運用於人文領域的重要資訊學者謝清俊教授提及：當電腦運用於人文與社會學科以來，人文學科計算（Humanity Computing）和社會學科計算（Social Computing）逐漸為大眾接受，而利用資訊科技為工具也就導引著人文和社會學科往嶄新的方向發展。當計算工作日久功深，超越了人工方法的極限，改變了學科原有的生態，也改變了學科的內涵、規範、社會實踐，以及與其他學科的關係。於是，出現人文資訊學（Humanity Informatics）和社會資訊學（Social Informatics）等名相。¹ 近年來，則有所謂數位人文學（Digital Humanity）一詞。回顧臺灣人文領域與資訊科技的結合，要溯及至 1984 年，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與歷史語言研究所合力推動之「史籍自動化計畫」，開啟將資訊科技運用於人文領域的風氣；其後，1998 年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中央研究院與國立臺灣大學共同推動之「數位博物館」先導計畫，並於 2002 年起轉為由人文學者主導，協同資訊領域專家，國內重要文史典藏機構共同參與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² 也促使臺灣重要檔案典藏單位對於檔案資訊系統建置，由線上目錄、館

¹ 謝清俊，《謝清俊談人文與資訊》（臺北：數位典藏維運管理分項計畫，2006），頁 134。

² 林富士主編，《「數位人文學」白皮書》（臺北：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2017），頁 23-26。

藏取用等檔案資訊查詢，擴展至全文資料庫、數位內容加值等文本探勘技術，進而朝向深化人文研究之發展邁進。³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於 2011 年建置上線之「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正是此人文與資訊科技結合發展過程中所建置數位內容成果之一。

如所周知，在日治臺灣史研究領域中，總督府歷年出版的《臺灣總督府職員錄》，⁴ 現今已成為基本的研究工具書，凡論述議題涉及中央或地方公務體系人事任免流動者，概以《臺灣總督府職員錄》作為入門史料，再以此為線索查詢《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總督府府報》、《臺灣日日新報》等相關檔案或報導。不僅如此，《臺灣總督府職員錄》亦具有實用性價值。早在 1950 年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成立初期，歷史學者王世慶先生即曾利用職員錄，為不少戰前在臺任職之日本人或臺籍公務員查得其服務機關及年資，助其順利領取退休金。⁵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得以作為公教人員之年資證明，以及學術研究的重要工具書，其原因除了總督府官方調查所代表之公信力外，更重要的是其兼具完整性與連續性之特色，足資瞭解總督府行政組織架構之變遷、機關單位之人員編制，以及公務人員職涯發展之歷程。

隨著臺灣檔案資訊系統之發展日趨成熟，並鑑於《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在臺灣史研究上的重要性，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特以之為標的，歷經數年、多方蒐集，將 1896 年至 1944 年之職員名錄進行全文建檔，建置約 95 萬筆的名錄資料，完成標準化著錄之數位內容系統，2011 年 9 月起正式上線開放應用。惟其應用範疇除了提供使用者名錄檢索與取用服務外，若可進一步利用資訊擷取技術分析大數據中的關連性資訊，擴大其在人文研究應用上的可能性，無疑將有助於深化人文研究，並為數位系統在人文研究應用發展之模式提供些許參考。

³ 王麗蕉、陳慧婷，〈檔案編排描述與資訊系統研究回顧與展望〉，收於薛理桂、王麗蕉主編，《臺灣檔案學研究回顧暨書目彙編（1946-2016）》（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2017），頁 73-105。

⁴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曾多次易名，現今所能尋得最早（1898 年）出版之職員錄題為《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06 年以降改稱《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1920 年復稱《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25 年以降再易稱《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為求行文方便，本文統稱《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⁵ 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丘慧君紀錄，《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135。

基於此故，本文特以日治時期公、小學校、國民學校之初等教育人力分析為中心，試以「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所收錄之日治時期官職員名錄，探討此系統在日治時期初等教育研究領域之應用，俾藉由其收錄具連續性與完整性之資訊特質，觀察臺灣初等學校體制變革與師資人力之整體圖像與歷年趨勢，以及運用職員錄中獨特的「本籍」登載資訊，分析日籍人士來臺擔任公職中不同都道府縣的差異，和探討臺籍人士在島內各州廳移動任教等跨境之實態，實證地瞭解數位系統對於深化人文研究可發揮之作用。

二、相關史料與研究回顧

本文旨在運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進行日治時期小、公學校、國民學校等初等學校人力發展與跨境流動等分析，以檢證數位系統在人文研究應用之可能性。故就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於人文研究之應用成果，和日治時期臺灣初等學校設置與師資等制度演進，以及初等學校師資相關研究，闡述本文之基礎研究背景。

（一）運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於人文研究成果

總督府職員錄運用於人文研究之成果，目前臺灣史學界關於日治時期的研究，凡涉及官僚體系運作、組織編制、官僚人事分析者，《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概為參考文獻中基本的工具書之一，論者往往以職員錄為基礎，掌握該分析主題之人事名單及其流動概況，再進一步查找《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或機關單位典藏之人事資料，逐一剖析官員之學經歷、晉用、升遷或離職原因。然而，儘管《臺灣總督府職員錄》作為檢索工具書之運用甚為普遍，將之作為研究主要素材或以之為研究課題者則不多。岡本真希子最具代表性的專著《植民地官僚の政治史》，即廣泛運用日本、朝鮮及臺灣出版之職員錄，另輔以其他公私人事檔案，剖析日本帝國官僚體系之制度性架構，以及學經歷、民族別與官僚任用、異動之關係。岡本尤其善於利用職員錄中揭載之各項官制，分析殖民統治者如何藉由任用資格等條件限制及薪俸、升遷等規定，從制度上維繫民族差別待遇之殖民統治體制。⁶

⁶ 岡本真希子，《植民地官僚の政治史：朝鮮・台湾總督府と帝国日本》（東京：三元社，2008）。

陳思琪之碩士論文〈日據時期臺北地區初等教育之研究〉，以專節分析教師之素質，由於該文係以今臺北市為研究範疇，難以直接運用戰前舊行政區劃的統計資料，乃以《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為本，逐年計算區域內各小、公學校之合格與代用教師人數，以及日、臺籍教員比例。⁷ 此外，日籍學者池田辰彰探討日治初期宜蘭廳下臺人之任用情形，以 1903 年至 1909 年之 6 個年度職員錄，發現宜蘭廳內的臺籍職員人數均維持在 40 人左右，但因基礎建設漸次整備，日本人逐年增加，臺籍職員人數所佔比例由 34% 逐漸減少至 20%，惟大體而言，已較其他地區偏高；其中，約 6 成係擔任公學校教員。⁸ 其後，池田再以類似之方法，統計 1903 年和 1913 年兩個年度、相差 10 年的總督府職員錄，藉分析本籍觀察日臺籍職員之任用概況及其變化。其研究發現，中央單位之臺籍職員人數次於東京、鹿兒島、熊本等三縣，位居第四；惟在地方單位則居首位，尤以擔任公學校之訓導、雇員等職務者為多，地方行政組織末端之區長、書記，更是清一色由臺人擔任，顯示總督府在初等教育領域及地方行政上頗仰賴臺人之力以推進殖民統治。⁹ 由池田之論著可知，運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所登載之本籍資訊，即可觀察總督府中央及地方單位職員任用趨勢之變化，並呈現區域差異，惜其研究僅限於日治初期至 1910 年代，和較小地域範圍。

同樣運用職員錄登載之本籍資訊從事研究者，尚有末武美佐之碩士論文〈沖繩籍教師與日治前期臺灣公學校教育（1898-1918）〉，該文旨在探究沖繩籍公學校教師之背景、發展與表現，以觀察沖繩與臺灣教育之連動性。其利用職員錄計算 1903-1918 年之 16 年間沖繩籍教師之人數，再運用總督府統計書分析沖繩籍教師佔公學校日籍教師之比例。其研究發現，沖繩籍教師僅佔 1.6% 至 6%，人數不多，任教地點以中南部——尤其南投、臺南兩廳居多，而沖繩籍校長之在職對於廳內同籍雇員之人數多寡及異動率高低，似有所影響。¹⁰ 惟該文類似池田的研

⁷ 陳思琪，〈日據時期臺北地區初等教育之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⁸ 池田辰彰，〈日本台湾統治時代初期宜蘭統治の研究〉（大阪：関西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論文，2011）。

⁹ 池田辰彰，〈台湾總督府職員錄から見た職員出身地と台湾人登用分析：明治 36 年から大正 2 年〉，《南島史学》（福岡）79/80（2013 年 3 月），頁 108-125。

¹⁰ 末武美佐，〈沖繩籍教師與日治前期臺灣公學校教育（1898-1918）〉（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究，亦僅止於 1910 年代及日治初期、出身沖繩的教師。此外，鄭文棟之碩士論文〈日治時期公學校臺籍教師之薪資研究〉，則以公學校正式教師中的臺籍教師為研究對象，利用職員錄登載之薪俸資訊觀察總督府之敘薪規則，尤其年資與薪俸變化之關係。¹¹ 惟作者僅挑選數屆師範畢業生為例，觀察其在職年間薪資增減之實況，而難以全面、貫時性地分析臺籍教師薪資變化趨勢、區域城鄉差異與薪資之關連性，以及比對日籍教師給薪規則之差異。

由前述池田等人的研究，雖因探討區域、涵蓋時間有限，不僅難以觀察整體、長期之趨勢，分析項目之廣度與深度亦受侷限，但從其研究已展現《臺灣總督府職員錄》除了作為查詢工具以外，作為深化研究的史料素材之可能性，亦可窺見數位系統在人文研究領域得以發揮之空間。因此，筆者也曾嘗試運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剖析臺灣女性在日治臺灣期間公務職場之變遷與發展，從 1907-1942 年長達 36 年間的職員名錄，整體觀之，臺灣女性僅佔所有臺籍公職人員不到一成；進而細觀其歷年的變化，自 1910 年代起開始緩步增加，至 1920 年代起大幅成長至超過一成，1930 年代又下降至低於平均值，而在 1940 年至 1942 年三年間提升至最高、約一成三。從臺灣女性公務職業觀之，從事教育工作者近七成五，主要即為公學校教師；其次為郵便局、電話交換所之通信人員亦近二成；極少數是看護婦、產婆等醫療從業者。普遍皆為職等與薪資相對偏低的職務，呈現臺籍女性在公務職涯上因殖民與性別之雙重結構差別所受之侷限。¹² 此研究係以《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特有本籍資訊，以及臺灣女性姓名登載「氏」的特性，運用具連續性、完整性的數位系統，擷取臺籍女性在總督府及其所屬官廳任職者，唯因臺灣女性擔任公職限制，擷取之研究資料為 1 萬 6 千多筆的臺籍女性名錄，仍屬小規模數位內容資訊。

（二）日治臺灣初等學校設置與教師任用

日治時期之初等教育制度幾經變遷，領臺之初以國費支辦「國語傳習所」及其分教場（分校），以教習日語。隨著國語傳習所漸次增設，國庫難以負荷，總

¹¹ 鄭文棟，〈日治時期公學校臺籍教師之薪資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8）。

¹² 王麗蕉，〈數位檔案系統在人文研究的應用：以總督府職員錄系統觀察臺灣女子公職發展〉，《圖資與檔案學刊》（臺北）10: 1（2018年6月），頁44-66。

督府於 1898 年新頒「臺灣公學校令」，將國語傳習所改制為地方經費負擔之「公學校」，向漢人學童施以日語、道德、實學等初等教育；另針對原住民設置修業年限較短的「蕃人公學校」。¹³ 又為鼓勵官吏攜眷渡臺，特別設置與日本國內相同的「小學校」，招收日人子弟就學，而形成漢人、原住民、日人之三軌教育制。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為因應民族自決思潮，不得不改革殖民地統治方針，臺灣總督府明揭同化主義政策，隨即由日本內閣於 1919 年以敕令第一號頒布「臺灣教育令」，首度確立臺人的教育體制，1920 年改革地方制度，將原「廳—支廳—區」之地方行政區劃改為「州—市—街庄」，公、小學校均由市街庄負責經營。1922 年雖再次公布新「臺灣教育令」，明訂中等以上教育機關取消臺、日人之別，開放共學，惟初等教育維持差別制度，分設小、公學校，廢除蕃人公學校，名義上改以常用日語與否作為就讀小學校、公學校之依據，實際上臺灣學童差別待遇之本質不變。隨著二次教育令的頒布和地方行政的變革，公學校迅速增設，由 1919 年的 438 所，大幅成長至 1929 年的 754 所，10 年間增加 316 所；相對的，小學校的數量則增加甚緩，由 128 所增為 134 所。¹⁴ 公學校之設立需全仰賴市街庄提供土地、建立校舍及支援營運經費，此一時期公學校擴充率之高，足證臺人對於新式教育之接受度大為提升。迨至 1941 年，日本政府依據「教育審議會」之建議，頒布「國民學校令」，將「小學校」改制為「國民學校」，臺灣亦隨之於同年修改「臺灣教育令」，規定初等教育依據「國民學校令」，取消小、公學校之別，一律改稱國民學校。¹⁵

在教師的任用方面，日治時期初等學校教職員可概分為以「教諭」、「訓導」等正式職位進用的合格教員，以及以「囑託」、「助教」、「心得」等臨時性職務聘用的代用教師。依據 1898 年「臺灣公學校官制」，公學校正式教師包含校

¹³ 原住民教育分為平地、山地兩種，針對平地原住民設置「蕃人公學校」，對於山地原住民則設置「蕃童教育所」。而「蕃童教育所」歸屬警務系統管轄，教職員由警察兼任，未收錄於職員錄中。

¹⁴ 「公學校」包含修業年限 6 年及修業 4 年的公學校（含本校及分教場），1919 年之數據包含蕃人公學校；「小學校」包含高等小學校、尋常小學校及分教場。參見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學務課，《臺灣總督府學事第十八年報統計書》（臺北：該課，1921），頁 102、132、160；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八年報》（臺北：該局，1932），頁 92、135。

¹⁵ 至此雖取消形式上的差別制度，但因課程仍分為第一、二、三號表，規定「常用日語家庭」之子弟入學「第一號表國民學校」（即原小學校），其餘家庭之子弟入學「第二、三號表國民學校」（即原公學校），故差別待遇之本質不變。

長、教諭及訓導。校長由教諭兼任，教諭為判任官，主導教學工作，依「判任官俸給令」給薪；訓導職級則為低於判任官之「判任官待遇」，負責協助教諭之職務，其薪資依總督所訂之「訓導俸給規則」支給。由於總督府特意在教育制度上預設限制，大體而言，臺籍教師只能擔任訓導，而日籍教師則可擔任教諭或校長。然而，與「臺灣公學校官制」同日公布的「臺灣小學校官制」，教員雖同屬判任官，惟職稱上不稱「教諭」而稱「訓導」，俾與日本國內初等教育制度保持一致。1922年新臺灣教育令頒布，總督府基於同化主義精神，師範教育取消臺、日籍生程度與資格之差別。隨之公布重新調整的小、公學校官制，教職員一律改稱訓導、准訓導，訓導需具備「正教員」合格證書，掌理學童教育，具有判任官資格，相當於過去的教諭；准訓導需具備「准教員」合格證書，其職責在協助訓導之職務，屬「判任官待遇」，相當於過去的「訓導」。至於代用教師，名稱亦隨官制之變遷屢有更迭，1918年改稱「教務囑託」、「教諭心得」、「訓導心得」；1922年以降統稱「教員心得」，1941年以後又再改稱「助教」。

要之，日治臺灣期間初等學校設置源自1898年，從專對臺灣人設置的公學校、原住民的蕃人公學校、和為日人設置的小學校；1922年開放日臺共學，廢除蕃人公學校名稱，仍分設公、小學校；至1941年起一律改制為國民學校。初等學校教師任用隨官制變遷，包括教諭、訓導、准訓導等合格正式教員，以及助教、教務囑託、教諭心得、訓導心得、教員心得、囑託、和雇員等代用臨時教師。

（三）日治臺灣初等教育史相關研究成果

隨著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研究之興起，¹⁶ 迄今關於日治時期初等教育師資相關研究已為數不少，其中運用量化分析者，依探討主題之不同，大致可分為兩種：一是利用《臺灣總督府統計書》、《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各州廳統計書等全島性或區域性之統計資料，檢視各年度日臺籍教職員數、合格教師與代用教師之比

¹⁶ 關於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研究之概況，可參見吳文星，〈近十年來關於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研究之動向（1991-2000）〉，《臺灣師大歷史學報》（臺北）29（2001年6月），頁221-238；彭煥勝，〈近60年來臺灣教育史學發展的回顧與省思〉，《教育科學研究期刊》（臺北）54:1（2009年3月），頁1-21；許佩賢，〈臺灣教育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2011-2013年）〉，《師大臺灣史學報》（臺北）7（2014年12月），頁113-146等論文，以及2008年以降歷年「臺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中的「教育史」研究回顧。

率，以及教職員性別比例等，作為評價整體性師資結構、供需與教學水平之參考，如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¹⁷ 游鑑明〈日據時期公學校的臺籍女教師〉、¹⁸ 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初等教育制度》、¹⁹ 謝佩錦〈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教師之研究〉、²⁰ 劉思吟〈臺北市萬華區日治時期初等教育學校之校園變遷〉²¹ 等。二是運用校史室或檔案館典藏之人事檔案，探討個別學校教師之日臺籍比例、性別比例、籍貫分布、薪資差異、師資流動等，以瞭解其師資結構與人事異動之實態，包括何憶如〈桃園縣新屋國小校史之研究（1905-2003）〉、²² 洪郁嫻〈日治時期「高雄第一公學校」之研究〉、²³ 王明全〈日治時期「高雄州枋寮公學校」之研究〉、²⁴ 翟芷萱〈日治時期高雄第三公學校之研究〉、²⁵ 胡博荏〈日治時期桃園龍潭公學校之研究〉、²⁶ 蔡牧耕〈日治時期朴子地區初等教育研究：以朴子公學校為例〉、²⁷ 蔡靜月〈日治時期苗栗山腳公學校之研究（1912-1945）〉²⁸ 等。

上述兩種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各有優劣之處，就前者而言，宏觀視野易掌握初等教育師資之全貌，惟其分析課題受限於史料本身呈現之統計項目，而往往偏重日臺籍人數比較、合格教師率、性別比率等面向。至於統計中未能得見之師資籍貫與

¹⁷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3）。

¹⁸ 游鑑明，〈日據時期公學校的臺籍女教師〉，收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輯，《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該系，1993），頁 559-633。

¹⁹ 李園會編著，《日據時期臺灣初等教育制度》（臺北：國立編譯館，2005）。

²⁰ 謝佩錦，〈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教師之研究〉（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5）。

²¹ 劉思吟，〈臺北市萬華區日治時期初等教育學校之校園變遷〉（臺北：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2013）。

²² 何憶如，〈桃園縣新屋國小校史之研究（1905-2003）〉（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²³ 洪郁嫻，〈日治時期「高雄第一公學校」之研究〉（臺南：臺南師範學院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²⁴ 王明全，〈日治時期「高雄州枋寮公學校」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²⁵ 翟芷萱，〈日治時期高雄第三公學校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²⁶ 胡博荏，〈日治時期桃園龍潭公學校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3）。

²⁷ 蔡牧耕，〈日治時期朴子地區初等教育研究：以朴子公學校為例〉（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²⁸ 蔡靜月，〈日治時期苗栗山腳公學校之研究（1912-1945）〉（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5）。

出身地分布、薪資結構比、流動率等影響任職穩定性之關鍵因素，則僅能透過時人輿論或報導加以推斷，欠缺量化史料之佐證，以致難免有以偏蓋全之嫌。就後者來說，以微觀視角耙梳單一學校之人事檔案，逐筆建構每一教師之學經歷與任職概況，亦得以之為基礎，就學歷、資格、待遇、在職年數等面向進行日臺籍和性別差異之分類比較，深度掌握分析對象之師資任教與流動情形，惟一旦欠缺與其他個案、地區或全島與內地之比較，則容易陷入見樹不見林之弊，而影響論述之客觀性。

綜合上述相關史料與研究成果，就日治時期初等教育師資相關研究，無論視角、方法與限制為何，所關懷之議題則頗具一致性，而可歸納為下列項目：1.日、臺籍教師員額比較；2.合格／代用教師率之歷年變化；3.教師籍貫分布；4.教師流動分析；以及5.日、臺籍教師之待遇差異。前二項可自官方歷年統計報告中取得較長期和整體資料，而後三項僅能仰賴人工方式，以少許樣本做小規模之探討，或利用其他敘述性史料作為佐證，實難以掌握整體性之全貌，和貫時性的趨勢，誠為日治時期初等教育史研究上一個難以突破之困境。然而，由前述從整體統計分析或個案經驗探究，在日治時期初等教育史之理解上，兩種視角與研究方法皆有其必要性，得以相輔相成，若能截長補短，運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之龐大資料彌補統計項目之缺憾，無疑將有助於拓展宏觀性師資結構分析之深度與廣度，並為微觀式個案研究提供整體性之參照數據，藉以判斷分析結果所示現象究竟屬普遍抑或特殊。

三、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編印與數位系統加值建置

數位系統運用於人文研究的關鍵，前述提及臺灣最早和人文學者合作進行數位計畫的資訊專家謝清俊教授，認為學者使用資訊是最講求完整性，若數位資訊產品的完整性沒有交代，許多學者寧可用紙本的資料。所謂完整性（information Integrity）是指資訊的來源是否交代清楚，所以不僅僅視其內容，更需兼顧其來源。完整性表現的是資訊的可信程度，所以是數位資訊產品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屬性。²⁹ 本文主要探討「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數位內容運用於人文研究的

²⁹ 謝清俊，《謝清俊談人文與資訊》，頁78。

可行性，因此，先追溯第一手原始資料《臺灣總督職員錄》的產生來源脈絡，再闡明「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建置資訊加值過程，和解釋擷取初等學校教師名錄資訊與進行研究資料正規化等處理程序，以驗證資訊正確性與研究可信度。

（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之編印及其內容價值

日本於領臺前，由官方編纂職員錄之制度已行之有年。早自 1868 年明治天皇即位，即由太政官編纂《官職通鑑》，內容係逐條載錄勅任官及地方府縣、軍隊重要主事者；同時，另編有依職務或地方別分類之《官員錄》，按月修訂。至 1874 年，太政官發布〈職員錄編制諸例則〉，首度針對職員錄編纂之體例與修訂時間等作全面性的規範，規定各機關需於每月 5 日呈繳勅奏官之職員錄；各府縣則需於每年 2、5、8、11 月編纂修訂，³⁰ 由太政官負責印刷，顯示明治政府開始試圖建立職員錄編纂之制度。民間人士如欲出版，則需向地方長官提出謄寫申請，再由地方首長呈報太政官裁量審核。³¹ 爾後鑑於「坊間出版之職員錄誤謬頗多，或過於省略，或發刊之際資料已過於陳腐，以致信用度不足，不便之處不少，而民間業者難以獲得精確之材料，編纂勢難完全，亦屬不得已，故職員錄改由官報局發刊，以期一掃向來之不便。」³² 自 1886 年起，改由內閣官報局以官報附錄形式發行《職員錄》，³³ 延續至今。

日本內閣官報局編印之《職員錄》自發刊起至二戰結束前，其內容編輯、收錄範圍及出版時間等歷經多次變革。自 1886 年至 1917 年，分為甲乙兩本，《職員錄甲》收錄中央官廳之職員名錄，《職員錄乙》收錄國內各地方官廳（含道府

³⁰ 〈職員錄編製諸例則〉(明治 7 年 12 月)，《太政類典・第二編・明治四年～明治十年・第三十九卷・官規十三・文書一》，請求番号：太 00261100，件名番号：023，「国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下載日期：2020 年 9 月 14 日，網址：<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

³¹ 〈東京府下寄留鹿兒島県士族神崎正誼等ヨリ太政官職員錄謄写願ノ儀照会〉(明治 10 年 3 月)，《公文錄・明治十年・第二百二十三卷・明治十年三月～五月・府県伺》，請求番号：公 02140100，件名番号：001，「国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下載日期：2020 年 9 月 14 日，網址：<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

³² 〈官報局発兌ノ職員録ヲ販売スルコトヲ稟定ス〉(明治 20 年 10 月 13 日)，《公文類聚・第十一編・明治二十年・第九卷・文書門・出版写真附・記録志表・印璽・受付》，請求番号：類 00296100，件名番号：023，「国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下載日期：2020 年 9 月 14 日，網址：<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

³³ 大藏省印刷局編集，《官報百年のあゆみ》(東京：該局，1983)，頁 63。

縣、市町村)之職員名錄;出版時間最初是甲早於乙,1896年以降改為同時出版。至1918年整併甲、乙合為一冊,收錄中央及地方判任官以上之官公吏員,於年中刊行;1923年因關東大地震資料燒毀,臨時編纂高等官的職員錄,翌年恢復出版判任官以上之職員錄。至1925年起,內閣再度修改編輯方針,分別編纂簡要版的「高等官職員錄」及完整版的「判任官以上」兩種職員錄,分別於每年1月、7月刊行,³⁴此一作法延續至1939年,因戰爭而再度調整。在1940年至1943年間,因戰爭時局之故,為節約用紙,僅出版高等官職員錄,³⁵1944年起更是中止出版,改以版面較小的《各廳職員抄錄》小冊子,³⁶內容僅收錄中央及地方一級行政單位首長,³⁷此一作法持續至戰後,迄1949年《職員錄》始再度復刊。

臺灣於1895年4月依據馬關條約割予日本,成為日本領土,故自同年起,島內官員亦成為內閣官報局編纂職員錄收錄之對象,惟僅收錄於中央官廳的《職員錄甲》,同年11月出版,包括「臨時臺灣電信建設部」、「臨時臺灣燈標建設部」等部門。自1896年起,始以「臺灣總督府」為單位,收錄其所屬各機關判任官及其同等待遇以上之正式官吏,不含非正式或臨時性之雇員、囑託等。³⁸1925年以降,《職員錄》改出版簡要版「高等官」及完整版「判任官以上」兩種版本,兩種均有收錄臺灣總督府及其所屬官職員,因此,其編纂及發行體例亦成為臺灣總督府出版所屬官署職員錄之參考依據。

臺灣總督府於領臺之初,除了被納入日本內閣官報局《職員錄》收錄範圍外,總督府民政局於1897年2月底,首度調查所屬高等官及判任官職員,於5月由該局總務部秘書課出版《臺灣總督府民政局職員錄》,發行後隨即發予各官署。³⁹

³⁴ 〈職員錄年2回發行に付原稿作成の件〉(大正13年11月8日),《外部回議(甲)・自大正12年10月至昭和6年12月》,請求番号:平15會計00011100,件名番号:019,「国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下載日期:2020年9月14日,網址:<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

³⁵ 〈大正十一年閣令第一号官報、法令全書、職員錄、官庁刊行図書月報等ノ發行ニ關スル件中ヲ改正ス 職員錄ノ掲載事項一部省略ノ為〉(昭和15年11月7日),《公文類聚・第六十四編・昭和十五年・第二卷・政綱二・統計調査・雜載》,請求番号:類02281100,件名番号:021,「国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下載日期:2020年9月14日,網址:<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

³⁶ 大藏省印刷局編集,《官報百年のあゆみ》,頁144。

³⁷ 印刷局,《各廳職員抄錄(昭和22年12月)》(東京:該局,1947),「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下載日期:2019年5月28日,網址:<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078939>。

³⁸ 詳見內閣官報局,《明治29年職員錄(甲)》(東京:該局,1897),「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下載日期:2019年5月22日,網址:<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779772>。

³⁹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總務部秘書課,《臺灣總督府民政局職員錄(明治30年2月現在)》(東京:該課,

然而，比對同年內閣官報局出版之《職員錄甲》可知，兩者無論組織機構或官員皆有諸多不同，蓋總督府廢軍政復歸民政後，中央及地方官制皆大幅調整，⁴⁰亦顯示該年府內組織及人事異動程度不小。《臺灣總督府民政局職員錄》編纂原因，礙於史料所限，難以得知，惟以其印刷後旋發配各機關，可推測其主要目的係於組織草創之際，提供官方內部行政作業參考之用。且因草創編纂之故，其小冊、橫式版面之形制，與後來總督府正式出版的職員錄亦有明顯的殊異之處。

現今所能得見由臺灣總督府正式出版且流通於府外之職員錄，最早一本乃係1898年委託臺灣日日新報社印刷和發行之《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最晚一本則是1944年由臺灣新報社印刷、臺灣時報發行之《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總計有1898、1902-1904、1906-1942年、和1944，橫跨42年度、共計44本（含1909年和1920年增刊「臨時版」）。

總督府所編纂之職員錄，其調查和發行頻度、收錄範圍往往因應政策或實際需求臨機調整。首先綜觀職員錄調查及發行時間，第一本1898年係11月中調查、12月底印行；自第二本（1902年）起至1919年間，概為每年上半年進行調查，最遲7月底前發行，惟此乃大抵之情形，實際上常因官制修改、行政整理或時局等因素而作調整，如1907年報載指出「總督府職員錄歷年皆於4月1日編纂，本年因即將修改官制，於5月1日編纂較合適」⁴¹因而延後調查；又如1913年則是於下半年的7月初調查、9月中旬發行。而自1920年起至1941年，大致上皆改為下半年7、8月調查，最晚於當年度會印行；但不知何故，1942年職員錄，11月才調查、且延遲至翌年3月底才發行；或因此故，總督府並未編纂1943年職員錄，且將1944年調查時間提前至1月，至6月才完成印行。故而自1906年起，歷年編印不輟的《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迄今卻遍尋不到1943年版。

再就《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收錄範圍與編輯體例，主要變動包括1909年和1920年因官制改革導致官職員大幅異動，分別增刊「臨時版」，其收錄範圍僅限

1897)，「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下載日期：2019年5月28日，網址：<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779874>。

⁴⁰ 該年度之《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指出：「本年度之政務，前半年度依據舊官制；後半年度依新官制掌理」，揭示該年度官制大幅革新之現象。參見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明治三十年度分〉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第三篇》（東京：該課，1900），頁2。

⁴¹ 〈總督府職員錄の編纂〉，《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4月3日，第2版。

判任官待遇以上之正式官吏，不含雇員、囑託。⁴² 又，因應 1909 年地方行政機關調整，「區」由下級行政輔助機構改為下級行政官署，故自翌年（1910）起增錄各廳內區長和書記名單。惟此一改動並未敘明於職員錄凡例中，僅在《臺灣日日新報》中公告周知讀者。⁴³ 再如自 1921 起收錄州市吏員、協議會員，則係配合州市街庄制實施而新增之職務。參見附表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收錄書目清單及名錄數量統計表。

如此講求實務性的總督府職員錄，其發行與流通情形究為如何？透過《臺灣日日新報》讀者屢屢投書詢問職員錄何時出刊，⁴⁴ 以及 1926 年總督府鑑於職員錄供不應求，擬增印數百部之報導，⁴⁵ 顯示職員錄似普遍為時人購買和利用，銷量甚佳。1925 年起，總督府將發行職員錄之業務由臺灣日日新報社轉交臺灣時報社承接，並言明其目的在「援助臺灣時報社」，⁴⁶ 亦足證刊行職員錄乃屬一大獲利事業。而當時民眾如何使用職員錄？曾有記者以職員錄為材料，分析臺灣人及女性在官場中的人數與職位變化，藉以觀察社會變遷現象；⁴⁷ 再就時任豐原街協議會員之張麗俊，在其 1931 年 7 月 13 日日記中記載，豐原信用組合討論職員昇給問題，爭議之間，即取職員錄檢閱，作為決議之參考。⁴⁸ 由此可知，職員錄中記載本籍、薪資等資訊，在時人眼中已不單單只是查找官職員的工具書，亦可藉以觀察性別、族籍、薪資等社會結構變遷現象，甚至活用於個人日常生活之中。

綜合前述，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無論收錄範圍、編纂或發行時間均頗具彈性，亦可瞭解其因應當時實務需求的使用價值。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內閣官報

⁴² 參見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明治 42 年 11 月）》（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9），凡例；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 9 年 12 月）》（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0），凡例。

⁴³ 〈總督府職員錄〉，《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7 月 12 日，第 2 版。

⁴⁴ 例如 1913 年職員錄受官制改正之影響較晚出版，便有讀者投書詢問出版時間；1920 年因調查時間較以往晚兩個月，出版時間隨之延後，亦有讀者投書詢問相同問題。參見〈十把一束〉，《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9 月 12 日，第 7 版；〈十把一束〉，《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 8 月 17 日，第 2 版。

⁴⁵ 如 1926 年報載「以往總督府職員錄印刷部數很少，往往出版後旋即售罄，今年準備多印數百部，俾便讀者於販賣店購買。」參見〈職員錄增版〉，《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0 月 28 日，夕刊第 1 版。

⁴⁶ 〈總督府職員錄〉，《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8 月 14 日，第 2 版。

⁴⁷ 〈本島人の職員〉，《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9 月 11 日，第 7 版；〈職員錄〉，《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7 月 30 日，第 7 版；〈職員錄一覽〉，《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5 月 29 日，第 4 版。

⁴⁸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說，《水竹居主人日記（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臺中縣文化局，2004），頁 397。

局因應戰爭期間，為節約用紙，自 1940 年起將職員錄之編纂範圍縮減為高等官，甚至於 1944 年中止出版職員錄之作法，而臺灣總督府皆未跟進，從當時行政作為觀之，此舉反應殖民政府於政務處理之獨立性，亦顯示臺灣於戰爭期間所面臨的資源窘迫壓力，小於或晚於日本國內。再就今日留下此珍貴官職員名錄一手史料，後人得以據之觀察臺灣總督府在戰爭期間組織編制、人力任用與流動更迭，顯見《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的史料內容與資訊價值。

（二）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建置與數位內容加值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不僅頗受時人重視，於今日的史學領域中，亦為從事日治時期研究者不可或缺之參考工具，已如前述。為將之活化以裨益於人文研究，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著手建置「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而其首要之務，如同謝清俊所言資訊完整性是數位資訊產品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屬性；且臺灣史的研究者更是講究資訊完整性和重視史料來源。因此，為完整蒐集臺灣官職員名錄，由研究人員主導，歷時多年海內外各方查訪，唯如前述，迄今發現由臺灣總督府正式印行的共計有 42 年度、44 本《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其中無法尋得者，不得不以日本內閣官報局印行的職員錄，包括 1896 年至 1897 年、1899 年至 1901 年、1905 年《職員錄甲》，以及 1943 年《職員錄》等 7 個年度中「臺灣總督府」官職員名錄替代之。終於蒐集到幾乎涵蓋日治統治臺灣期間，自 1896 年至 1944 年，49 年間、51 本職員錄。

在完成各方資料來源和完整資訊蒐集後，「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建置過程，必須分析資訊內容及其特性，也需奠基於使用者資訊需求和想要解決的問題。職員錄編纂體例，影響系統建置過程之資訊內容著錄規範、標準化加值作業。在整體資訊架構方面，《臺灣總督府職員錄》除官職員名錄外，於卷首會收錄官等俸給制相關法令，各機關單位前亦收錄該組織相關規則或官制。考量職員錄最主要的史料內容與資訊價值，因此系統主要處理資料標準化的標的為名錄資料，而卷首官制、規則等組織章程，以及書末廣告等附錄，則以數位影像方式呈現。

著手進行名錄資訊內容著錄與標準化加值過程中，逐一檢視近 50 年間職員錄內容，由於無論總督府正式印行的《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或由內閣官報局替

補年度，不僅調查發行時間、收錄官職員範圍時有變革，且各年度名錄編輯體例亦有很大差異，如《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自1903年起開始登載的本籍資訊，是日本內閣或朝鮮總督府職員錄未有的。經詳細分析51本職員錄編輯體例及各年度名錄資訊特徵後，設計系統收錄名錄的資料結構標準，包括：名錄代碼、姓名、日本紀年、西元紀年、單位名稱、本籍、官職名、職等、薪俸、職稱、兼任職務、軍職或位階、居住地址、書冊名（出處）、頁碼、相關詞、備註等17項資料元素，前5項為必備欄，其餘資料欄位則依職員錄內容照實建檔。

各資料元素著錄內容的規範，以「照錄」各年度職員錄史料所記載原有資料為原則，建檔字碼以現今中文慣用字為主，如職員錄中有不同年度本籍寫法不一，如「岩手」有時寫為「巖手」，或寫法與現今不同，如「鹿兒島」當時寫為「麿島」等情形，皆以「照錄」史料內容為原則，再建置同義詞，以利使用者查詢。再者，為利各年度名錄階層瀏覽，針對單位名稱一欄，著錄時需將上層單位帶入，以二層級方式著錄；而為因應提供限定臺灣人之進階查詢，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特有的本籍一欄，將原「本島人」著錄使用者較為直覺的「臺灣」，但自1920年起地方改制後，職員錄改以登載臺灣人的州廳本籍，則回復照錄各州廳名稱。最終完成的「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系統使用前臺界面設計有：名錄查詢、組織瀏覽、電子書等三大數位服務功能。

經由全數名錄資訊內容加值與數位系統建置，從職員錄系統可統計出整體名錄數量，自1896年至1944年間，總計收錄近95萬筆官職員名錄資料；亦可細觀各年度名錄數量，總督府印行的職員錄，自1898年至1920年凡例載明收錄範圍大致為：府、廳及其所轄官衙之高等官、判任官及其同等待遇者、雇員、囑託，即不同於內閣印行的，多增加了雇員與囑託等臨時人員，但不含傭員、雜給支薪者、巡查、看守等，名錄數量由4千多，大抵逐年成長至近1萬7千筆；自1921年起至1944年間，收錄範圍大致同前，新增州市吏員、各種委員會職員、州市協議會會員及其他認為有揭載必要者，名錄數量由近2萬筆，逐年穩定成長至1936年已突破3萬人，之後大幅成長，三年後（1939年）超過4萬人，1942年新增至5萬多人，最後1944年則多達5萬8千多筆名錄。參見附表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收錄書目清單與名錄數量統計表。

另，由日本內閣編纂的職員錄，編纂方針及收錄範圍幾經變遷，已如前述，《職員錄甲》僅收錄判任官以上之正式官吏，未收錄雇員、囑託等官制定員以外之約聘或臨時人員，復由附表一可知，殖民初期總督府名錄數量大致不超 5 千人，以 1905 年為例，相較前三年職員錄，明顯少於總督府收錄雇員與囑託等臨時人員的名錄數；1943 年《職員錄》更僅收錄高等官及其同等待遇者，相較前後兩個年度超過 5 萬多的名錄數量。經由歷年職員錄數位內容加值後，可明顯發現不同來源之間的差異，進而比較之，亦可初步瞭解總督府殖民體制與編制人力變化。唯《臺灣總督府職員錄》雖自 1898 年開始印行起，即收錄雇員、囑託，但排除以雜支給付之傭員，以及因人數龐大，亦不收錄警察體系之巡查、看守，欲查詢者，需另參考《警察職員錄》。⁴⁹ 又各年度職員錄調查時間不一，未必能將所有任職於總督府的官職員完全收錄，如即未收錄任期僅有兩個月的南弘總督。⁵⁰ 諸此皆為資訊來源先天的史料條件，成為限制系統收錄範圍與資訊內容的決定性要素。

（三）系統資料內容補實與研究資料擷取驗證

本文旨在運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擷取和分析日治臺灣初等學校教師名錄，發揮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獨有刊載本籍（出身地）的特點，以補實前人研究中全面性探討教師出身地及其跨境流動分析的不足。因此，研究程序是先進行名錄資料中本籍補齊等資訊正規化處理；接著，根據前述初等教育體制變革和日治教育史相關研究，訂定本文之資料篩選規則，擷取所需的資訊內容，檢視研究資料的完整性；並在分析研究過程中反覆驗證資訊內容正確性，以提高研究的可信程度。茲簡述如下。

首先，在名錄資料中本籍一欄的補齊，《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自 1903 年起特有登載的本籍，但仍有 1930 年、1909 年臨時版、1944 年等三個年度並未刊載，

⁴⁹ 參見五谷昌平編，《臺灣總督府警察職員錄（大正 2 月 7 日現在）》（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1913）；臺灣警察協會編纂之《臺灣總督府警察職員錄》（含 1917、1919、1920、1925、1930、1940 等 7 個年度），以及 1931 年日本警察新聞臺灣支局編纂之《臺灣警察年代幹部職員錄》（東京：日本警察新聞社，1931）等。

⁵⁰ 南弘總督（1869-1946），日本富山縣人，1932 年 3 月在犬養毅內閣支持下出任第 15 任臺灣總督，3 月 2 日到任，同年 5 月即因齋藤實內閣成立，為轉任遞信大臣而求去，5 月 26 日卸任總督一職。參見鍾淑敏，〈南弘〉，收於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頁 548。

且經由資訊內容加值後，亦發現每年度名錄缺本籍者，平均也有一成左右。此外，以內閣印行的《職員錄甲》、《職員錄》替補者，亦未刊載本籍。然而，本籍是觀察官職員出身、跨境移動、和社會網絡連結的關鍵資訊特徵。鑑於官職員任職的連貫性，和系統收錄原始資料的完整性，透過定義姓名、任職單位、官等職稱等相同資訊比對規則，經由近 50 年間、近 95 萬筆數位名錄資訊內容，成功補實本籍的名錄數量達近 90 萬筆，已約為全部名錄的 95%。（參見附表一）然而，考量本文除了要觀察初等師資人力、日臺籍比例、跨境流動等整體性圖像外，亦要進一步探討其貫時性的變遷與差異。因此，先排除 1909 年和 1920 年兩個年度的臨時版，再因 1905 年僅補實至 83%，將影響歷年比較的基礎，本研究最終選擇採用由總督府印行的《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自 1906 年起至 1942 年，除了 1930 年補齊至 93% 外，整體 37 個年度的名錄本籍補實接近 99%。至此，不僅資料來源具一致性，資訊內容也達相當的完整性，足以證實運用於人文研究的可信度。

接著，定義研究資料蒐集範圍和擷取所需的名錄資訊，如同前述臺灣自新頒「臺灣公學校令」，將國費支辦的國語傳習所改制為地方負擔之「公學校」，同時公布「臺灣公學校官制」與「臺灣小學校官制」；在「臺灣教育令」新頒與再頒布後，調整小、公學校官制；直至 1941 年又修改「臺灣教育令」，規定初等教育依據「國民學校令」，取消小、公學校之別，一律改稱國民學校。故而，本研究依此法令沿革與相關規範，篩選單位名稱中有「公學校」、「小學校」、或「國民學校」名錄資料，自 1906 年至 1942 年共 37 年度 82 萬多筆名錄，擷取出近 20 萬筆名錄的數位資料集；再檢視其官職名，包括教諭、訓導、准訓導等正式教師，以及助教、心得、囑託、雇等代用教師。為利後續日、臺籍教師比較分析，在數位資料集中增列「本籍 2」一欄，將臺灣各州廳一律改為臺灣，巖手與岩手一律改為岩手等，以利統計教師出身地及其跨境分析。另再篩選出 1921 年至 1942 年臺籍教師名錄的子資料集，和新增「學校所屬州廳」一欄，以利探討臺籍教師在島內的跨境比較。

綜言之，基於前面闡述《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編印和史料價值，「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建置及其數位內容加值，以及研究資料擷取與正規化處理，以證明數位內容資訊的來源與完整性，進而檢驗數位內容的可信度。以下先就整體初等學校置與教師人力歷年數量，並比較職員錄與學事統計，檢證此名錄數位系統

在人文研究的可信度；接著，從日籍教師分析其公教比例，和比較各都府道縣的差異性；最後，探討臺籍教師歷年人數變化，分析州廳的差異，進而比較各州廳教師的跨境流動情形。

四、臺灣初等學校教師人力發展：1906-1942

在整體觀察日治臺灣初等學校教師人力之結構性圖像與貫時性變化前，先逐年比較職員錄與學事統計中教師人數，以再次檢驗職員錄系統在人文研究之可信度，接著，分析教師人力在總督府公職整體比重與歷年增長，以及教師資格比例與本籍歷年變化等。

（一）初等學校教師歷年人數分析：職員錄與學事統計之比較

前述回顧日治時期教育史研究者，皆以《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臺灣學事一覽》或《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等統計數據，觀察教師人數及學校數之變化。本文將職員錄系統篩選之結果，自 1906 年至 1942 年，擷取出任職於初等學校者共計 198,034 筆名錄，和整理自學事統計之數據，⁵¹ 列表比較如表一。首先，學校設置數量，相較前述以學事統計觀察公學校、小學校數自 1919 年的 438、128，至 1929 年增加為 754 和 134，而職員錄登載學校數，分別由 439、125 增加為 752、134，兩者數據相當接近。再逐年比較兩者教師人數，大多數年份是職員錄數據略多於學事統計。主要原因在於職員錄會再列出兼職名錄資料，若同一教師兼有多職，則會計算成多筆名錄。加以兩者調查時間不同，遂影響學校數量與教師人數統計數值極些微的差異。

由圖一兩者相關接近的數據呈現，亦可驗證職員錄數位加值後，完整性與連續性資訊內容運用於人文研究的可信度。再以職員錄中歷年初等學校數量與教師人數統計，可觀察日治臺灣初等學校新設與教師人力成長的貫時性趨勢，從 1906 年 800 多人，至 1918 年教師人數突增超過 3 千人（較前一年度成長超過二成之

⁵¹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1-36（臺北：臺灣總督府，1906-1942）；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學事一覽》昭和 16、18 年度（臺北：該局，1941、1943）。

表一 初等學校教師職員錄與學事統計表

年度	職員錄公學校數量	職員錄小學校數量	合計／國民學校數量	職員錄教師人數	學事統計教師人數
1906	180	14	194	862	816
1907	190	13	203	934	843
1908	206	18	224	1,007	995
1909	223	24	247	1,155	1,097
1910	238	37	275	1,367	1,210
1911	251	43	294	1,628	1,393
1912	265	56	321	1,504	1,574
1913	280	74	354	1,744	1,704
1914	294	91	385	1,910	1,886
1915	306	101	407	2,073	2,046
1916	328	105	433	2,275	2,291
1917	335	103	438	2,548	2,742
1918	422	120	542	3,071	3,253
1919	439	125	564	3,565	3,907
1920	497	129	626	4,326	4,571
1921	534	133	667	5,264	5,440
1922	646	133	779	5,808	5,746
1923	718	132	850	5,968	5,866
1924	729	130	861	6,115	5,912
1925	732	133	865	6,116	5,814
1926	740	133	873	6,182	5,941
1927	744	131	875	6,232	5,962
1928	748	133	881	6,221	6,024
1929	752	134	886	6,306	6,151
1930	758	134	892	6,390	6,290
1931	758	133	891	6,558	6,456
1932	758	133	891	6,590	6,528
1933	768	134	902	6,806	6,774
1934	773	134	907	7,036	7,014
1935	782	136	918	7,384	7,299
1936	781	138	919	7,841	7,758
1937	786	146	932	8,511	8,345
1938	794	146	940	9,283	9,076
1939	812	148	960	10,131	9,953
1940	826	150	976	11,038	10,785
1941			1,005	12,501	12,076
1942			1,037	13,784	13,18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原始資料參見《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06年至1942年；《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1-36；《臺灣學事一覽》昭和16、18年度。



圖一 初等學校教師人力統計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原始數據整理自《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06年至1942年；《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1-36；《臺灣學事一覽》昭和16、18年度。

多），原因與公學校、小學校設置於當年皆有較大幅成長，合計新增百餘所密切關連；此後，隨著臺灣教育令頒布、配合地方改制初等學校改由市街庄經營、和第二次教育令再頒，1922年公學校再新增加百餘所，也使當年度教師人數成長一成、接近6,000人，短短4年間，教師人數成長接近一倍；爾後的十多年則呈現穩定數量，直至1937年起，教師人數由8,000多人逐年成長，在1941年改制為國民學校後，臺灣初等學校數量已達1,000餘所，教師人數超過12,000人。

（二）初等學校教師在總督府公職人力的比重

接著，觀察初等學校教師在公職人員之比例，礙於總督府編纂之統計書欠缺全體公職人數之統計，歷來相關研究皆難獲致此一數據。但可由職員錄的資料，以整體觀之，初等學校教師人數約佔所有公職人力的24%，亦即平均近4位公職人員中即有1位是初等教師。進一步細觀歷年之變化，初等學校教師最初僅佔12%，至1918年已超過20%，如同前述當年度公、小學校新設百餘所之多；其後逐年成長，於1920年代呈現一波高峰，逐年增加並超過平均值、接近30%；至

表二 日治時期初等學校教師佔全體公職人力比例

年度	教師人數	公職總人數	教師佔公職比	年度	教師人數	公職總人數	教師佔公職比
1906	862	6,952	12%	1925	6,116	19,991	31%
1907	934	7,583	12%	1926	6,182	20,808	30%
1908	1,007	8,200	12%	1927	6,232	21,635	29%
1909	1,155	8,997	13%	1928	6,221	22,916	27%
1910	1,367	10,079	14%	1929	6,306	24,010	26%
1911	1,628	11,203	15%	1930	6,390	25,623	25%
1912	1,504	11,413	13%	1931	6,558	26,218	25%
1913	1,744	11,498	15%	1932	6,590	26,259	25%
1914	1,910	12,164	16%	1933	6,806	27,272	25%
1915	2,073	12,298	17%	1934	7,036	28,331	25%
1916	2,275	12,849	18%	1935	7,384	29,576	25%
1917	2,548	13,309	19%	1936	7,841	31,321	25%
1918	3,071	14,522	21%	1937	8,511	34,456	25%
1919	3,565	16,155	22%	1938	9,283	38,098	24%
1920	4,326	16,786	26%	1939	10,131	41,538	24%
1921	5,264	18,752	28%	1940	11,038	45,874	24%
1922	5,808	19,756	29%	1941	12,501	49,971	25%
1923	5,968	20,430	29%	1942	13,784	55,096	25%
1924	6,115	21,181	29%	合計	198,034	823,120	2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原始資料參見《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06年至1942年。

1930年起，則穩定維持在25%左右。由教師在公職比重的歷年變化，再次印證新臺灣教育令發布和地方制度變革後，臺灣初等教育在1920年代確實出現高度的普及發展。然而，自1937年起教師人數雖有較大幅度的成長，但以其佔公職比重，則未呈現同樣增長幅度，大抵維持在24%-25%。詳見表二。

（三）初等學校教師資格與出身地分析

有關教師資格與本籍等結構性分析，自1906年至1942年間，近20萬筆名錄（198,034），從職員錄中官等與職稱加以分析，正式教師，包括教諭、訓導和准訓導等合格教師佔77%，其餘如助教、心得、囑託、雇員⁵²等非正式教師則佔23%。若再分析教師籍貫，從職員錄中本籍進行分析，⁵³日籍教師佔53%、臺籍

⁵² 本文延續前人研究成果，將任職於初等學校之雇和囑託視為代用教師。其中，擷取出雇員人數僅7,800人（約4%），聘用年代集中於1906-1922年間，有7,700多人；1923之後，僅有100多人。若以日、臺籍區分，約1/3是日籍雇員（2,600多人），2/3是臺籍雇員（約5,200人）。

⁵³ 本文若涉及本籍分析，係以本籍補實後名錄資料，並排除本籍是空白的名錄，以利分析比較基礎的

教師佔 47%，另有清國、樺太等非日臺籍教師不到 10 人。進一步交叉分析教師資格，日籍教師中，正式教師比例高達 82%，而臺籍教師則為 72%，兩者相差有 10% 之多。由整體結構分析，可窺見臺灣人在日治時期教育政策下，無論是求學或任教，有相當差別待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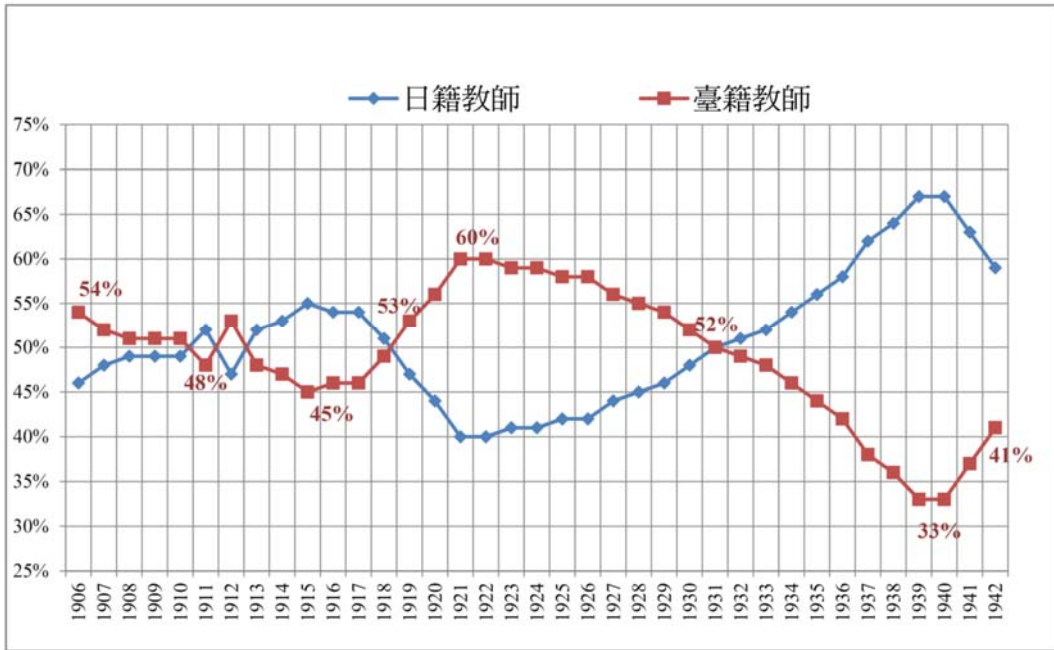
在日籍教師佔 53%、臺籍教師為 47% 的整體統計結果，進一步觀察日臺籍教師人數歷年變化，自 1906 年起，臺籍教師稍多於日籍教師，至 1910 年代，日籍教師逐年成長，多過臺籍教師。自 1919 年起，臺籍教師人數又超過日籍教師，其原因概與前述所提 1920 年代初期各地方「公學校」新設大幅增加有關；然而，自 1932 年起，臺籍教師比例低於五成，逐年下降至 1939、1940 年僅 33%。參見表三。

表三 日臺籍教師人數與比例分析

年度	日籍教師	比例	臺籍教師	比例	年度	日籍教師	比例	臺籍教師	比例
1906	395	46%	460	54%	1925	2,570	42%	3,540	58%
1907	449	48%	479	52%	1926	2,620	42%	3,558	58%
1908	486	49%	509	51%	1927	2,767	44%	3,457	56%
1909	563	49%	578	51%	1928	2,771	45%	3,446	55%
1910	654	49%	674	51%	1929	2,873	46%	3,430	54%
1911	816	52%	756	48%	1930	2,843	48%	3,126	52%
1912	710	47%	793	53%	1931	3,262	50%	3,293	50%
1913	901	52%	842	48%	1932	3,351	51%	3,238	49%
1914	1,004	53%	899	47%	1933	3,561	52%	3,242	48%
1915	1,143	55%	927	45%	1934	3,774	54%	3,260	46%
1916	1,231	54%	1,039	46%	1935	4,122	56%	3,256	44%
1917	1,364	54%	1,181	46%	1936	4,552	58%	3,286	42%
1918	1,567	51%	1,504	49%	1937	5,258	62%	3,251	38%
1919	1,670	47%	1,888	53%	1938	5,963	64%	3,320	36%
1920	1,897	44%	2,423	56%	1939	6,736	67%	3,392	33%
1921	2,090	40%	3,166	60%	1940	7,360	67%	3,678	33%
1922	2,314	40%	3,484	60%	1941	7,912	63%	4,587	37%
1923	2,421	41%	3,545	59%	1942	8,135	59%	5,643	41%
1924	2,530	41%	3,577	59%	合計	104,635	53%	92,727	4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原始資料參見《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06 年至 1942 年。

一致性。因此，原自 1906 年至 1942 年，共計 198,034 筆名錄，扣除 660 筆無本籍名錄後，為 197,374 筆。故而可由表三發現，1930 年日臺籍教師人數皆較前一年度少，是因本年度職員錄中未刊載本籍，雖以系統比對補實到 92%，未補足本籍的名錄尚有 420 多筆，不如其他年度高達 99%，但不影響以日臺比例相較歷年變化的分析結果。



圖二 日臺籍教師比例變化（1906-1942）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原始數據整理自《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06年至1942年。

前人研究指出，就合格教師觀之，1937年係日臺籍教師消長之分界點，自該年起，日籍合格教師始超越臺籍，其原因在日籍教師應公學校擴張而大增之故。⁵⁴ 惟若以師資總體結構而論，此一消長之勢，早自1932年已然出現，參見圖二；而原因是否為公學校擴張，就前述統計公學校大量新設是在1922、1923年，兩年度增設近兩百所之多，值得再深究日本殖民教育政策和地方臺人的應變實態。

五、日籍教師人力發展及其跨境比較

依據前述整體結構分析，自1906年至1942年之37年間，在初等學校師資，約佔所有公職人力24%，而日籍教師是超過臺籍教師。然日人來臺擔任總督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的公教人力究為如何？以原有計取得82萬餘筆名錄數位資料集，

⁵⁴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頁163。

排除本籍為空白的名錄後為 81 萬多筆，以下依序分析日籍公職歷年人數變化及其比例，日籍教師在公職比重變化，以及日本都府道縣來臺任教的差異。

（一）日籍人士擔任公職人數與歷年變化

日本殖民臺灣期間，日籍人士來臺擔任總督府的官職員佔絕對優勢，整體而論，日籍公職人力多達 62 萬多次，約佔全體公職的 77%，另有極少數如中華民國、英國等非日臺籍人士約 400 人，不到 1%。就歷年變化，初期日籍人士比例接近九成，至 1920 年代下降至平均值之下，到 1930 年代又增長至約佔八成，至 1942 年又下降至 71%。詳見表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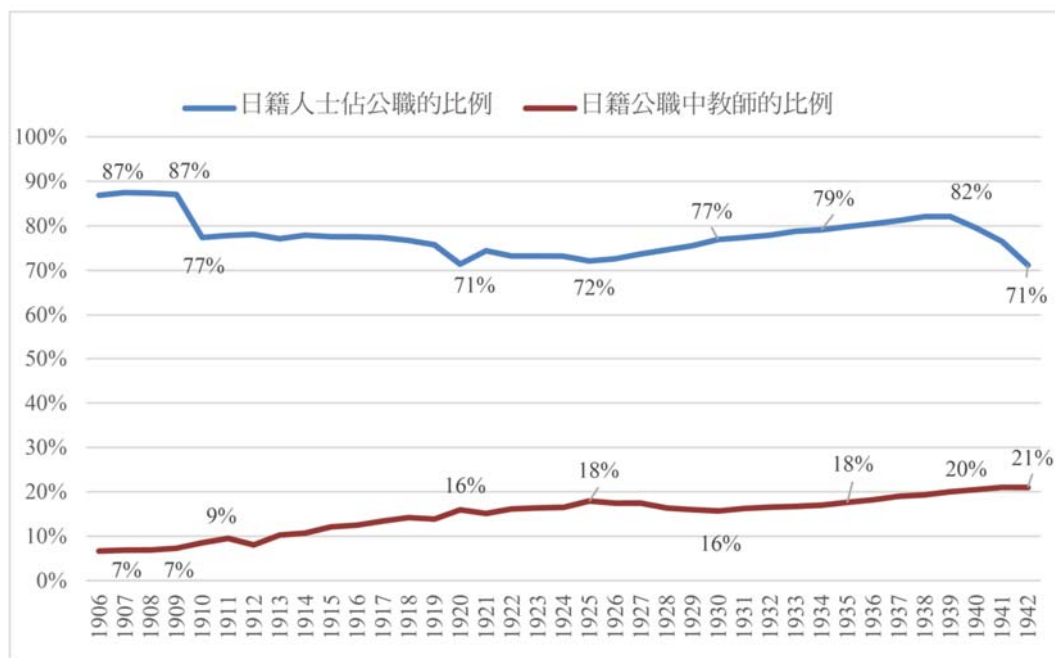
表四 日籍人士公職與初等教師人數統計

年度	全體公職	日籍公職	公職比例	日籍教師	教／公比	年度	全體公職	日籍公職	公職比例	日籍教師	教／公比
1906	6,823	5,928	87%	395	7%	1925	19,863	14,329	72%	2,570	18%
1907	7,476	6,540	87%	449	7%	1926	20,666	15,010	73%	2,620	17%
1908	8,046	7,029	87%	486	7%	1927	21,492	15,847	74%	2,767	17%
1909	8,835	7,691	87%	563	7%	1928	22,666	16,922	75%	2,771	16%
1910	9,908	7,671	77%	654	9%	1929	23,763	17,958	76%	2,873	16%
1911	10,979	8,548	78%	816	10%	1930	23,545	18,123	77%	2,843	16%
1912	11,264	8,795	78%	710	8%	1931	25,912	20,056	77%	3,262	16%
1913	11,370	8,770	77%	901	10%	1932	26,013	20,267	78%	3,351	17%
1914	12,000	9,349	78%	1,004	11%	1933	27,016	21,294	79%	3,561	17%
1915	12,153	9,430	78%	1,143	12%	1934	28,079	22,214	79%	3,774	17%
1916	12,707	9,854	78%	1,231	12%	1935	29,309	23,396	80%	4,122	18%
1917	13,120	10,154	77%	1,364	13%	1936	31,029	24,974	80%	4,552	18%
1918	14,371	11,034	77%	1,567	14%	1937	34,066	27,662	81%	5,258	19%
1919	15,904	12,051	76%	1,670	14%	1938	37,611	30,877	82%	5,963	19%
1920	16,658	11,899	71%	1,897	16%	1939	40,957	33,628	82%	6,736	20%
1921	18,565	13,819	74%	2,090	15%	1940	45,158	35,918	80%	7,360	20%
1922	19,563	14,326	73%	2,314	16%	1941	49,162	37,622	77%	7,912	21%
1923	20,206	14,796	73%	2,421	16%	1942	54,425	38,764	71%	8,135	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原始資料參見《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06 年至 1942 年。

（二）日籍教師在公職比例及其歷年變化

由前述日人來臺擔任公職多達 62 萬多次，其中有 10 萬多人為初等學校教師，僅佔日本來臺擔任公職人力的 17%。觀歷年比例變化，不同於前述擔任公職



圖三 日籍人士佔公職比例與日籍教師佔公職比例歷年變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原始數據整理自《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06年至1942年。

歷年消長變化，而是由最初不到一成，逐年緩步增加至接近平均值，直到最後達到最高的21%，詳見表四。再由圖三更明顯看出兩者差異，1910年代日籍公職比例下降時，擔任初等教師比例是逐年增加的，而至1942年日籍公職下降至最低71%時，日籍教師比例仍維持最高21%。

由前述日籍人士佔77%之多，而初等學校日籍教師在所有公職之比例，卻不及二成，即使隨著初等教育發展，日籍教師人數與比例逐年穩定成長，由1906年的7%逐年成長至1942年的21%，但平均仍只佔所有公職人數的17%。此現象顯見，日人在公職中所能扮演角色及擔任職務，遠較臺人更加多樣性與發展性。

(三) 日籍教師人力發展與跨境差異

從日人至殖民地的跨境與職務分析，究竟來臺日人出身何處，所從事公教職務有無區域的差異？茲利用職員錄中之本籍資訊進行統計分析，以觀察日人在殖

民地的跨境移動現象。先以日籍公職人力數量分析，依序是鹿兒島（88,000 多）、熊本（60,000 多）、福岡（35,000 多），接著東京、佐賀、大分、廣島、山口、長崎和宮城等地方，數量介於 19,000 至 28000 之間；前十名數量加總為 34 萬、超過一半日籍公職人力。主要集中最靠近臺灣的九州，以及本州兩大區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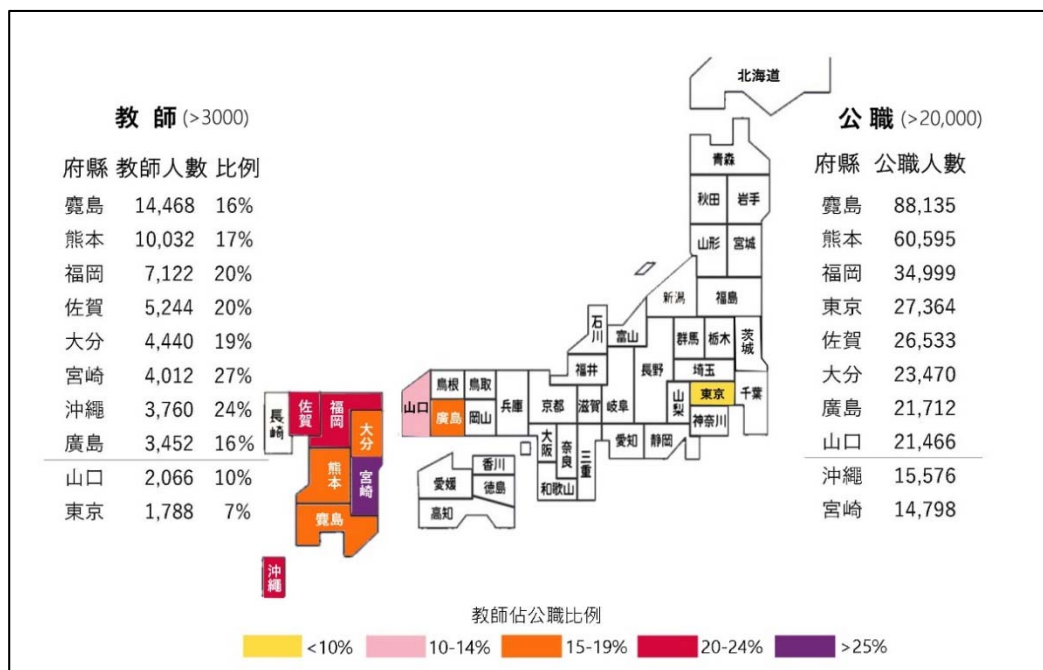
再就日籍來臺公職人力中從事初等教育工作者，超過 3,000 人次的府縣，依序為九州的鹿兒島、熊本、福岡、佐賀、大分、宮崎、和沖繩，和本州的廣島，來自 8 個府縣的教師總數為 52,000，已超過日籍教師的一半。交叉比對來臺擔任公職人數的都道府縣，前三名同樣都是位於九州的鹿兒島、熊本、福岡；但地處本州位居第 4 的東京都與第 8 的山口縣（擔任總督人數最多的府縣），⁵⁵ 其擔任教師數量分別只有近 1,800 和 2,000，故再細究其擔任教師的比例分別只有 7%、10%，低於日籍人士任教師的平均值（17%）；而宮崎與沖繩兩地，則是最高的 27% 和居次的 24%。

末武美佐以職員錄觀察 1903-1918 年間沖繩籍公學校教師佔總體日籍公學校教師之比例，指出其比重僅 1.6% 至 6%，影響力有限；⁵⁶ 惟依據本文統計，1906-1942 年間沖繩籍初等教師共 3,760 人，在各都道府縣中排名第 7，實為數不少，且初等教師的比例更達到 24%，高居第 2 名。兩研究結果的差距或因所設定之時間斷限與研究對象不同所致。但本文之研究結果可提供吾人再度思考沖繩教師對臺灣之影響，以及兩地教育連動性之發展。

簡言之，日人來臺擔任公職，總人數歷年來有消有長，但居絕對優勢，皆超過七成；唯比例雖逐年增加，但從事初等教育者平均僅佔公職人士不到二成。交叉分析整體日籍公職人士及其擔任初等教師的出身地，日本在殖民臺灣期間，日人來臺擔任教師，相對是集中在九州地區，如同來臺出任公職的地緣關係，但從位於本州的東京和山口，也發現日本各府縣跨境的差異性。參見圖四。

⁵⁵ 日本領臺期間，共歷經 19 任總督，其中有 5 人出身山口縣，集中於殖民初期，分別為第二任桂太郎（1896.6-1896.10）、第三任乃木希典（1896.10-1898.2）、第四任兒玉源太郎（1898.2-1906.4）、第五任佐久間左馬太（1906.4-1915.4，任期最長的臺灣總督），以及第十一任上山滿之進（1926.7-1928.6）。參見黃昭堂著、黃英哲譯，《臺灣總督府》（臺北：前衛出版社，2002），頁 72、114-115。

⁵⁶ 末武美佐，〈日治前期臺灣公學校的沖繩籍教師（1895-1918）〉，《臺灣學研究》（新北）11（2011 年 6 月），頁 62、84。



圖四 日籍公職人力與初等學校教師之跨境比較（1906-1942）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原始數據整理自《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06年至1942年。

六、臺籍教師人力發展及其跨境流動

從前述日籍教師人力與跨境分析可知，日人在總督府公務職場發展具有絕對優勢，日籍教師總數亦超過臺籍教師，但就從事初等教育比例觀之則不到二成。反觀在此情勢下，臺人在總督府殖民體制下公教領域發展又是如何，茲就1906年至1942年臺籍公職人力和臺籍教師歷年變化，1921年至1942年間各州廳分布，以及臺籍教師跨境移動等，分析如下。

（一）臺籍公職人力與從事教職之歷年變化

以出身地觀察臺籍人士在日治時期擔任公職情形，如前所述，整體而論，臺籍人士只佔所有公職人力的23%（183,342人次）。以年度變化觀察，參見表五，由起初不到千人、約佔一成多，至1910年起突破二成；逐年緩步增加至1920年

表五 臺籍公職與臺籍教師人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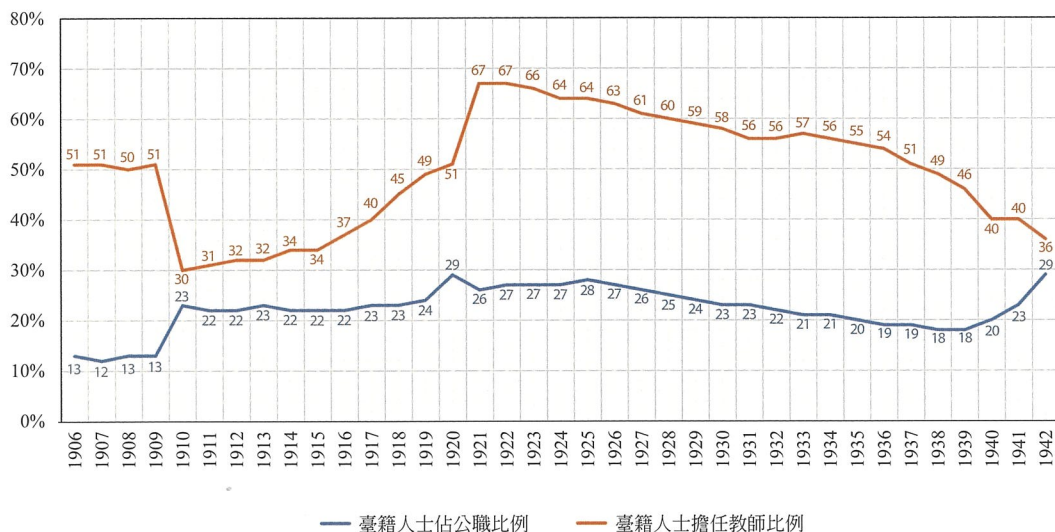
年度	臺籍公職人數	臺籍佔公職比	臺籍教師人數	教師在公職比	年度	臺籍公職人數	臺籍佔公職比	臺籍教師人數	教師在公職比
1906	894	13%	460	51%	1925	5,520	28%	3,540	64%
1907	931	12%	479	51%	1926	5,638	27%	3,558	63%
1908	1,015	13%	509	50%	1927	5,625	26%	3,457	61%
1909	1,140	13%	578	51%	1928	5,722	25%	3,446	60%
1910	2,233	23%	674	30%	1929	5,782	24%	3,430	59%
1911	2,428	22%	756	31%	1930	5,411	23%	3,126	58%
1912	2,465	22%	793	32%	1931	5,841	23%	3,293	56%
1913	2,596	23%	842	32%	1932	5,732	22%	3,238	56%
1914	2,648	22%	899	34%	1933	5,709	21%	3,242	57%
1915	2,720	22%	927	34%	1934	5,854	21%	3,260	56%
1916	2,846	22%	1,039	37%	1935	5,905	20%	3,256	55%
1917	2,958	23%	1,181	40%	1936	6,048	19%	3,286	54%
1918	3,328	23%	1,504	45%	1937	6,396	19%	3,251	51%
1919	3,852	24%	1,888	49%	1938	6,723	18%	3,320	49%
1920	4,750	29%	2,423	51%	1939	7,314	18%	3,392	46%
1921	4,735	26%	3,166	67%	1940	9,224	20%	3,678	40%
1922	5,224	27%	3,484	67%	1941	11,518	23%	4,587	40%
1923	5,393	27%	3,545	66%	1942	15,631	29%	5,643	36%
1924	5,593	27%	3,577	64%	合計	183,342	23%	92,727	5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原始資料參見《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06年至1942年。

代，皆超過平均值；1930年代又逐年下降至低於二成，至1941年人數成長至超過萬人、比例回復至平均值，並在1942年大幅增長至近三成。

再從臺籍公職人士中，臺人任初等學校教師人數為9萬多人，整體的比例是超過一半（51%），且臺籍教師幾乎皆是任教於公學校。細觀歷年人力變化，自1921年起臺籍公職人力中擔任教師比例突增至67%，逐年緩步下降，但至1936年皆超過平均值，爾後再降至1942年的36%。參見圖五。

交叉比對分析臺籍公職比及其從事教師比例，顯示1920年代間臺人任公職比例之增加，應係臺籍教師人數增加、且超過日籍教師所致。由臺籍教師佔所有臺籍公職人力五成左右，相較於日籍人士擔任教師者不到二成，高出許多，可知「公學校」始終是臺人晉身公職之列，相對容易而較普遍之途徑。換言之，即使在同化政策時期下，臺人膺任公職之機會雖有成長，但以初等學校人力發展觀之，仍侷限於公學校教師等基層的職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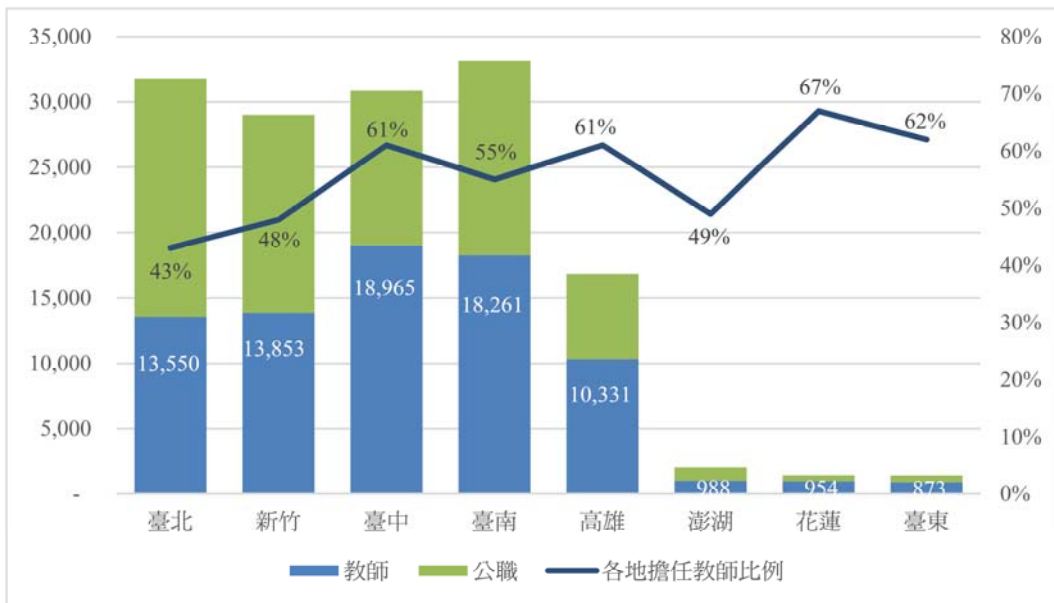
圖五 臺籍人士佔所有公職比例及從事初等教師的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原始數據整理自《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06年至1942年。

(二) 臺籍教師出身地本籍分析：1921-1942

從臺籍教師出身地分析，由於職員錄中臺人之本籍，最初僅登載為「本島人」，隨1920年地方改制，整併為5州2廳後，1921年起，職員錄中臺人之本籍才開始登載各州廳；其中澎湖島原隸屬於高雄州下，1926年起獨立設廳，本籍亦隨之由高雄州分出。故本文以1921年至1942年間，臺籍公職人員名錄，共計146,538筆，擷取出臺籍教師77,775筆名錄的數位資料。

先分析臺籍公職人士的出身地，依序是臺南、臺北、臺中、新竹、高雄等5州，前4州人數相差不多，介於33,000至29,000人，高雄則為近17,000人，而澎湖2,000多，花蓮和臺東皆僅有1,400人。再從臺籍公職中擔任教師人數觀之，則依序是臺中和臺南的18,000多人，接著是新竹、臺北的13,000多人，以及高雄10,000多人，最後依然是澎湖、花蓮和臺東3廳，皆不到1,000人。交叉分析後，亦發現臺灣各州廳任教師比例，和日本各府縣類似，存在區域的差異，如同



圖六 臺籍公職人力及擔任教師人數與比例（1921-1942）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原始數據整理自《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21年至1942年。

首都東京一般，臺北人從事公學校教師比例最低是43%，而臺中和高雄人則皆超過六成，花蓮更多達67%。詳見圖六。

再從臺籍初等教師中，以姓名中登載「氏」者篩選出臺籍女性初等教師，約1萬人，如同筆者先前研究結果，臺灣女性在總督府公務職涯發展，從事教育者佔大多數，其中主要擔任公學校教師。⁵⁷就臺籍女性擔任公學校教師的出身地，依序是臺北、臺中、臺南、新竹、高雄、澎湖、花蓮和臺東，相較於整體臺籍教師出身地，依序為臺中、臺南、新竹、臺北等州廳，有不一樣分布。

（三）臺籍教師跨境移動分析：1921-1942

根據前述臺籍教師名錄數位資料集中，再新增「任職學校所在州廳」一欄，可深入探討臺各州廳教師的移動情形。交叉比對分析，就整體而言，臺籍教師在出身地所在學校任教比例相當高，教師跨境移動至外地就職僅有5%。先就教師人數較

⁵⁷ 王麗蕙，〈數位檔案系統在人文研究的應用：以總督府職員錄系統觀察臺灣女子力公職發展〉，頁41-63。

表六 臺籍教師在島內跨境移動統計：1921-1942

學校所在地 教師出身地	臺北 學校	新竹 學校	臺中 學校	臺南 學校	高雄 學校	澎湖 學校	花蓮 學校	臺東 學校	小計	外移人數 及比例 ⁵⁸	
臺北市	13,176	52	52	60	80	0	91	28	13,539	363	3%
新竹州	456	12,345	273	115	288	3	294	67	13,841	1,496	11%
臺中州	104	38	18,384	220	147	0	61	9	18,963	579	3%
臺南州	53	10	67	17,606	463	41	3	13	18,256	650	4%
高雄州	21	7	15	234	9,847	64	31	112	10,331	484	5%
澎湖廳	2	0	0	30	99	856	0	1	988	132	13%
花蓮廳	33	2	0	0	3	0	897	19	954	57	6%
臺東廳	0	0	0	12	9	0	24	828	873	45	5%
小計	13,845	12,454	18,791	18,277	10,936	964	1,401	1,077	77,745	3,806	5%
移入人數	669	109	407	671	1,089	108	504	249	3,806		
比例	5%	1%	2%	4%	10%	11%	36%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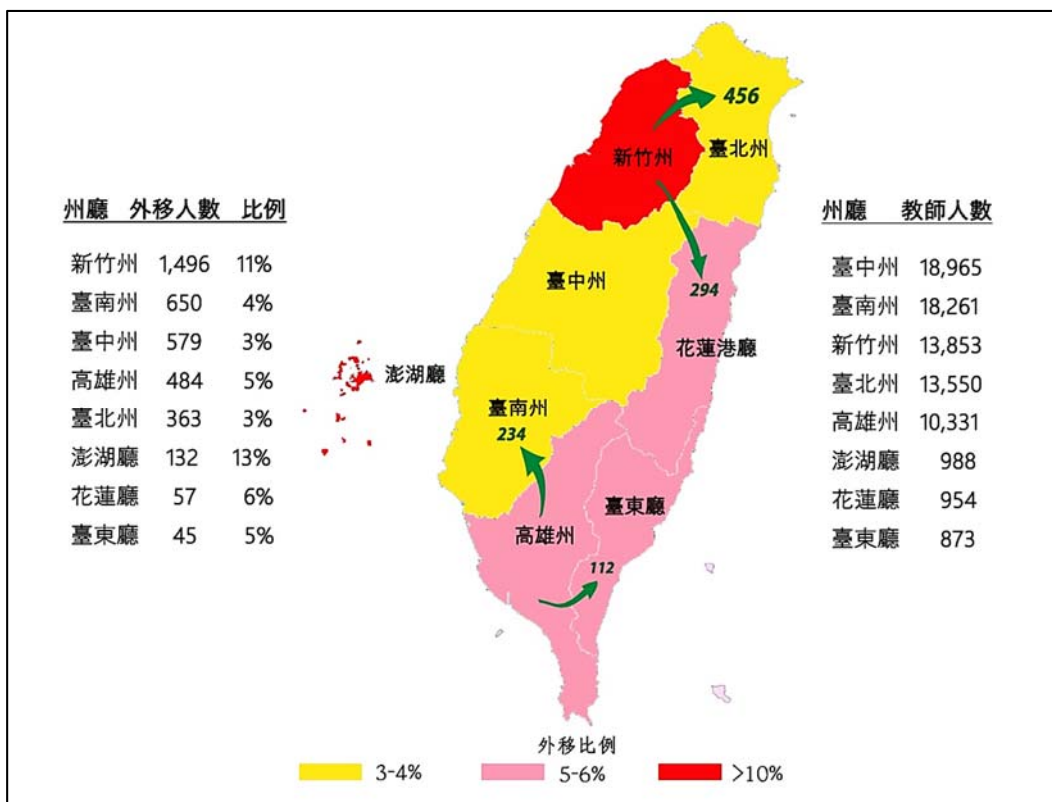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原始資料參見《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21年至1942年。

多的5州分析，以新竹州人外移的比例最高、人數也最多，約每10位教師有1位移居外地任教，外移學校所在地遍及全臺，依序是臺北、花蓮、高雄和臺中等地。

反之，就各州廳初等學校師資移入情形，5州中以高雄州所屬學校任用外地人的比例最高，亦相當10位教師中有1位是自外地移入，主要是臺南人、其次是新竹人。另分析花、東兩廳學校，移入外地教師比例更高達36%和23%，花蓮學校外地教師以新竹人為主，臺東學校則以高雄人移入最多。詳見表六。

綜合分析臺籍教師跨境移動結果可知，臺籍初等教師人數以臺中州和臺南州位居前一、二位，且參照前述兩地方任教師比例亦高達61%與55%，應與臺中州和臺南州學校師資需求高，有連動的供需關係。再觀之教師人數相當的臺北市和新竹州，新竹人外移任教比例（11%）遠高於移入者（1%），相較於臺北人反而是外移比例（3%）低於移入者（5%），同時參照前述任教比例新竹人與臺北人分別是48%和43%，皆較平均值低，進而可知各州廳學校需求教師數量，限制在地人士任教機會，如新竹州人必須外移任教，而臺北學校仍需移入5%外地教師，應受臺北市人從事教職比例相對較低有關。

⁵⁸ 本文擷取臺籍教師在1921年至1942年間名錄數位資料集共77,775筆，經分析各州廳教師移動，主要在島內，前往汕頭、廈門等島外學校任教者僅30筆（分別是臺北11、新竹12、臺中2、以及臺南5），人數極少，故不列入跨境統計討論。



圖七 臺籍教師外移至各州廳任教情形：1921-1942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原始數據整理自《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21年至1942年。

最後，再比較外移比例較高的兩個州，外移人數和比例最高的新竹州人，前往臺北州任教最多，第二是遠赴花蓮港廳；而高雄州人則以前往臺南州最多，其次是前往臺東廳。由此，可窺見影響臺籍教師島內跨境流動任教因素，除了職場供需之外，地緣關係亦應是其中關鍵因子。參見圖七。

七、結論

現今存世之《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自1898年起編印，收錄對象除總督府及所屬機關學校高等官、判任官外，亦涵蓋囑託、雇員等臨時性基層人力，自1902年起至1944年之40餘年間，幾乎印行不輟。相較於日本內閣印行之《職員錄》，

因戰爭期間，自1940年起縮編僅收錄高等官，甚至1944年起停止刊行等情形。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不僅收錄對象涵蓋範圍較為完整性，歷年編輯體例也較具連續性，其中登載官職員的「本籍」資訊，更是日本內閣職員錄和另一殖民地朝鮮總督府職員錄所未有，具有無可替代的獨特性價值。

有鑑於職員錄的史料價值，中研院臺史所著手建置「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先歷經多年、海內外各方蒐集，終完成自1896年至1944年所有官職員名錄，其中，有7個年度遍尋不著，故以日本內閣職員錄替補之。再以此具完整性、連續性、與獨特性的史料基礎上，詳細分析名錄資料結構，以及考量史學研究者資訊需求，設計資訊內容加值標準，完成近95萬筆名錄數位內容系統。自2011年正式上線以來，不僅是歷史學界判讀《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等官方檔案，和註解私人日記中人物經歷之重要學術資訊查詢工具，⁵⁹亦擴及到家族尋根，甚至選舉爭議話題的史料證據等日常生活應用。⁶⁰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在人文研究應用，如同前述，凡涉及官僚體系、組織編制、人事分析等，概以之為基本參考工具。在日治時期初等學校教師研究方面，雖已有少數研究以職員錄作為研究素材，唯僅侷限於較小區域或較短時間，難以觀察其全面性圖像和長期性變遷。而宏觀的研究，則是利用學事統計等年鑑資料，檢視教師資格、性別與籍貫等，評論整體性師資結構、供需與教育政策關係等；唯以統計數據，是無法探究教師出身地、職等薪資和跨境流動等人事實態。因此，本文試圖以「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中數位內容資訊，探究日治臺灣初等學校教師人力及其跨境流動。

本文全面釐清職員錄的資料來源，再經由系統中官職員任職接續之特性，先補實名錄中本籍資訊，考量資訊內容的完整性，是研究資料可信的關鍵，最終選擇自1906年至1942年間，共37年度職員錄，約計82萬多筆，本籍補實比例達99%。從中擷取出任職於公學校、小學校，以及後改制為國民學校之初等學校教師有19萬8,000多人。並先與歷年學事統計的數據比較之，兩者教師人數相當

⁵⁹ 可參考中研院臺史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中所收錄之林獻堂、楊水心、黃旺成等私人日記中的人物註解，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

⁶⁰ 參見林婷嫻，〈日記 boy、總督府職員錄，帶你穿越日治時期的臺灣〉，收於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編輯群，《研之有物：穿越古今！中研院的25堂人文公開課》（臺北：寶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頁84-95。

接近，大抵上職員錄刊載的教師數量稍多於學事統計，此乃因職員錄會分別登載本職與兼職名錄資料，透過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中的名錄資料分析，不僅可以交互驗證相關數據的正確性，和進一步分析教師佔全體公職人力的比例。且因職員錄收錄每間學校及其教師的任職資訊，便於掌握個別學校之設置沿革及其教職員名錄，除了整體公教人力圖像外，對於個別校史研究而言，職員錄更具有不可取代的史料價值。

本文從職員錄中擷取出的初等學校教師人數分析，自 1906 年至 1942 年間，約每 4 位公職中就有 1 位是初等學校教師；觀察歷年增長趨勢，1920 年代成長至接近三成最高。再從師資出身地分析，日籍教師超過一半（53%），多於臺籍教師（47%），僅極少數是清國和樺太人；和細究歷年日臺籍教師比例變化，在 1920 年代臺籍教師人數較多，比例將近六成。由職員錄歷年名錄分析初等教師在公職比重提升、和臺籍教師多於日籍教師情形，應與當時「臺灣教育令」頒布，和公學校制度配合地方改制等，公學校大量新設有關，據以觀察在總督府相關教育政策變革，影響日治臺灣期間公教人力比重，臺人公職的機會與發展的限制。

再就日籍教師人力與跨境分析觀之，從所有日籍公職人力 62 萬餘人，約佔全體公職近八成（77%），其中擔任初等教師者約 10 萬多人，僅是日籍公職人力的 17%。再分析來臺任教者之籍貫，主要集中於九州地方，與來臺擔任公職人數排名一致，前三位同樣都是來自鹿兒島、熊本與福岡等三縣；但深入分析各都道府縣公職人員中從事初等教師的比例，就發現來臺任公職人數相對也多的東京府與山口縣，教師比例僅有 6%和 10%；而宮崎與沖繩任教比例高達 27%與 24%。由此可瞭解日人來臺擔任公職，主要集中於九州與本州，與臺灣有地緣關係和日本各地方政治勢力歷史有關，但不同都道府縣從事教職人力差異，應與日本各地區域經濟發展有關。因此，職員錄數位內容，除了可補足先前研究侷限於日治初期或小規模區域的限制外，亦可如卞鳳奎探討鹿兒島人在臺北，⁶¹ 和在基隆的沖繩縣人⁶² 等，據以進行日人移居海外殖民地的相關研究。

⁶¹ 卞鳳奎，〈從《臺北市民住所錄 內地人ノ部》登錄簿來看日據時期鹿兒島縣人在臺北市的移民狀況〉，《臺北文獻（直字）》（臺北）190（2014 年 12 月），頁 191-227。

⁶² 卞鳳奎，〈日本時期在基隆的沖繩縣人(1895-1943)〉，《臺北文獻（直字）》194（2015 年 12 月），頁 139-189。

最後，觀察臺籍教師人力與各州廳教師跨境流動分析，在所有臺籍公職 18 萬多人中，從事初等教師者約 9 萬多人，且幾乎是任教於公學校，亦即 2 位臺籍公職人員中有 1 人是公學校教師；1920 年代臺人任教比例提高至接近六成，此應與當時公學校大幅擴增有密切關係；然至戰爭期間，臺人任教比例降至不到四成，而臺籍人士佔所有公職比重反而提升，其中是否與總督府戰爭期間對臺灣人的動員政策有關，值得深究。進而以總督府職員錄改登載臺籍人士的出身州廳之本籍資訊，分析自 1921 年到 1942 年間，臺籍教師人數依序是臺中州、臺南州、新竹州、臺北州和高雄州，皆超過一萬多人，其餘 3 廳則都不到千人。從各州廳教師跨境現象分析，5 州中以新竹教師平均每 10 人就有 1 位移至外地任教比例最高，外移前往的學校遍及各州廳，三成前往臺北州，近二成移至花蓮港廳；反觀而移入新竹州學校者僅 1%，顯示新竹師資有「供過於求」之現象。而就花、東兩廳公職人力中任教比例皆超過六成，然而移入兩廳的教師比例亦相對較高，由此亦突顯各州廳公教人力發展的差異性，而其箇中緣由，值得進一步探討。

綜合上述關於日治時期初等學校及其教師人力發展分析，皆能獲得先前研究未能提出的全面性觀察面向與長期性具體數據。如初等教師在所有公職人力中的比重與歷年變化，特別是官職員出身地的分析、公教人力區域差異、和跨境流動的歷史真實面貌等，除了應用在初等教育史研究，補足先前研究侷限於小區域或短時間或定期性研究的缺憾外，亦可應用於日人海外活動等議題研究，以及臺人在日治期間人力發展，如從臺籍教師中出身臺中州為全臺最多，可進一步探討是否與地方公學校設置和街庄長治理有關，如清水街長楊肇嘉，⁶³ 也曾擔任公學校訓導；或與師範學校設置、公費畢業生服務義務年限與分發辦法等具有關連性。再如可探討臺灣藝術史發展與初等教師養成及其職涯關係，如著名藝術家陳澄波、⁶⁴ 李澤藩等人，皆就讀國語學校和擔任過公學校訓導工作。蓋以職員錄完整

⁶³ 楊肇嘉 (1892-1976)，臺中清水人。自 1914 年至 1919 年任職公學校，1920 年至 1924 年擔任地方改制後第一任清水街長。日治期間，積極參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領導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參見中研院臺史所「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中所收錄之楊肇嘉個人文書檔案全宗〈六然居典藏史料〉，網址：<http://tais.ith.sinica.edu.tw>。

⁶⁴ 陳澄波 (1895-1947)，嘉義人。自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畢業後，自 1917 年至 1923 年擔任公學校訓導。1924 年赴日就讀東京美術學校，1926 年以《嘉義街外》油畫作品入選第七屆帝國美術展覽會。1947 年 3 月在二二八事件中遭難逝世。參見中研院臺史所「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中所收錄之〈陳澄波畫作與文書〉檔案全宗，網址：<http://tais.ith.sinica.edu.tw>。

與連續性之特色，可更全面性觀察與深化探究人流與跨境等議題，有助於拓展宏觀性社會結構分析之深度與廣度，並提供微觀式個案研究之整體性參照數據。亦即，數位內容系統建置，不僅是提供資訊查詢與取用的輔助工具，透過數位內容增值與資訊技術工具引入，更是在數位資訊時代擴展多樣性研究與深化人文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環。

附表一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收錄書目清單及名錄數量統計表

西元	書名	印行者	調查時間	發行時間	凡例中載明的收錄範圍	系統收錄名錄的比例	有本籍實名錄	本籍補實名錄	本籍補實比例
1896	職員錄甲	內閣印刷局	明治 29 年 11 月 1 日	明治 30 年 1 月 9 日	除北海道廳府縣職員以外之高等官、判任官及其他重要職員。	2,895	0%	462	16%
1897	職員錄甲	內閣印刷局	明治 30 年 11 月 1 日	明治 30 年 12 月 16 日	除北海道廳府縣職員以外之高等官、判任官及其他重要職員。	3,581	0%	826	23%
1898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明治 31 年 11 月 15 日	明治 31 年 12 月 31 日	一府三縣三廳及其所轄官衙之高等官、判任官、雇員、囑託。	4,235	0%	1,351	32%
1899	職員錄甲	內閣印刷局	明治 32 年 2 月 1 日	明治 32 年 4 月 29 日	除北海道廳府縣以外各官廳之高等官及同等待遇者、判任官及同等待遇者及其他重要職員。	4,395	0%	1,263	29%
1900	職員錄甲	內閣印刷局	明治 33 年 4 月 1 日		同上	4,898	0%	1,862	38%
1901	職員錄甲	內閣印刷局	明治 34 年 4 月 1 日	明治 34 年 7 月 20 日	同上	4,805	0%	2,318	48%
1902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明治 35 年 3 月 31 日	明治 35 年 6 月 30 日	府、廳及其所轄官衙之高等官、判任官及其同等待遇者、雇員、囑託（不含傭員）。	6,386	0%	4,618	72%
1903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明治 36 年 4 月 1 日	明治 36 年 6 月 20 日	府、廳及其所轄官衙之高等官、判任官及其同等待遇者、雇員、囑託（以雜給支薪者除外）。	7,210	89%	7,061	98%
1904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明治 37 年 4 月 1 日		府、廳及其所轄官衙之高等官、判任官及其同等待遇者、雇員、囑託（不含傭員）。	6,873	87%	6,687	97%
1905	職員錄甲	內閣印刷局	明治 38 年 5 月 1 日	明治 38 年 8 月 19 日	除北海道廳府縣以外各官廳之高等官及同等待遇者、判任官及同等待遇者及其他重要職員。	4,347	0%	3,622	83%
1906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明治 39 年 4 月 1 日	明治 39 年 5 月 15 日	府、廳及其所轄官衙之高等官、判任官及其同等待遇者、雇員、囑託（不含傭員）。	6,952	86%	6,823	98%
1907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明治 40 年 5 月	明治 40 年 6 月 15 日	同上	7,583	87%	7,476	99%
1908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明治 41 年 4 月 1 日	明治 41 年 5 月 13 日	府、廳及其所轄官衙之高等官、判任官及其同等待遇者（不含巡查、看守）、雇員、囑託。	8,200	85%	8,046	98%

西元	書名	印行者	調查時間	發行時間	凡例中載明的收錄範圍	系統收錄名錄的比例	有本籍的比例	本籍補實名錄	本籍補實比例
1909/05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明治 42 年 4 月 1 日	明治 42 年 5 月 10 日	同上	8,997	84%	8,835	98%
1909/11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明治 42 年 10 月 25 日	明治 42 年 11 月 17 日	府、廳及其所轄官衙內判任官以上之職員。	3,516	0%	3,278	93%
1910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明治 43 年 5 月 1 日	明治 43 年 7 月 13 日	府、廳及其所轄官衙之高等官、判任官及其同等待遇者(不含巡查、看守)、雇員、囑託。	10,079	87%	9,908	98%
1911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明治 44 年 5 月 1 日	明治 44 年 7 月 25 日	同上	11,203	88%	10,979	98%
1912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明治 45 年 4 月 1 日	明治 45 年 5 月 20 日	同上	11,413	90%	11,264	99%
1913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大正 2 年 7 月 1 日	大正 2 年 9 月 17 日	同上	11,498	89%	11,370	99%
1914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大正 2 年 5 月 1 日	大正 3 年 6 月 30 日	同上	12,164	89%	12,000	99%
1915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大正 4 年 7 月 16 日	同上	12,298	89%	12,153	99%
1916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大正 5 年 5 月 1 日	大正 5 年 7 月 7 日	同上	12,849	90%	12,707	99%
1917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大正 6 年 5 月 1 日	大正 6 年 6 月 30 日	同上	13,309	90%	13,120	99%
1918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大正 7 年 5 月 1 日	大正 7 年 7 月 6 日	同上	14,522	89%	14,371	99%
1919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大正 8 年 5 月 1 日	大正 8 年 7 月 25 日	同上	16,155	87%	15,904	98%
1920/08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大正 9 年 7 月 1 日	大正 9 年 8 月 25 日	同上	16,786	92%	16,658	99%
1920/12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大正 9 年 10 月 10 日	大正 9 年 12 月 15 日	總督府及所屬官衙、州廳判任官待遇以上之職員(不含巡查、看守)。	9,157	87%	9,043	99%

西元	書名	印行者	調查時間	發行時間	凡例中載明的收錄範圍	系統收錄名錄的比例	有本籍實名錄的比例	本籍補實名錄	本籍補實比例
1921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大正 10 年 7 月 1 日	大正 10 年 9 月 20 日	總督府、所屬官衙、州廳內之高等官、判任官及同等待遇者(不含巡查、看守)、州市吏員、囑託員、雇員。	18,750	92%	18,565	99%
1922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大正 11 年 7 月 1 日	大正 11 年 9 月 15 日	同上	19,756	91%	19,563	99%
1923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大正 12 年 7 月 1 日	大正 12 年 9 月 27 日	總督府、所屬官衙、州廳內之高等官、判任官及同等待遇者(不含巡查、看守)、地方待遇職員、州市有給吏員、囑託員、雇員。	20,430	91%	20,206	99%
1924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大正 13 年 7 月 1 日	大正 13 年 9 月 3 日	同上	21,181	91%	20,933	99%
1925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發行：臺灣時報發行所 印刷：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大正 14 年 7 月 1 日	大正 14 年 9 月 25 日	同上	19,991	93%	19,863	99%
1926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發行：臺灣時報發行所 印刷：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大正 15 年 8 月 1 日	大正 15 年 10 月 10 日	總督府內之高等官及其同等待遇者、判任官及其同等待遇者(不含巡查看守)、地方待遇職員、有給吏員、囑託員、雇員、各種委員會職員、州市協議會會員及其他認為有掲載必要者。	20,808	92%	20,666	99%
1927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發行：臺灣時報發行所 印刷：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昭和 2 年 8 月 1 日	昭和 2 年 11 月 3 日	同上	21,635	92%	21,492	99%
1928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發行：臺灣時報發行所 印刷：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昭和 3 年 9 月 20 日	昭和 3 年 12 月 10 日	同上	22,916	92%	22,666	99%
1929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發行：臺灣時報發行所 印刷：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昭和 4 年 8 月 1 日	昭和 4 年 11 月 10 日	同上	24,010	92%	23,763	99%

西元	書名	印行者	調查時間	發行時間	凡例中載明的收錄範圍	系統收錄名錄的比例	有本籍的比例	本籍補實名錄	本籍補實比例
1930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發行：臺灣時報發行所 印刷：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昭和5年8月1日	昭和5年12月3日	同上	25,623	0%	23,545	92%
1931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發行：臺灣時報發行所 印刷：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昭和6年8月1日	昭和6年10月20日	同上	26,218	92%	25,912	99%
1932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發行：臺灣時報發行所 印刷：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昭和7年8月1日	昭和7年10月24日	同上	26,259	92%	26,013	99%
1933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發行：臺灣時報發行所 印刷：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昭和8年8月1日	昭和8年10月18日	同上	27,272	92%	27,016	99%
1934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發行：臺灣時報發行所 印刷：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昭和9年8月1日	昭和9年10月25日	同上	28,331	92%	28,079	99%
1935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發行：臺灣時報發行所 印刷：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昭和10年7月1日	昭和10年9月23日	同上	29,576	91%	29,309	99%
1936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發行：臺灣時報發行所 印刷：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昭和11年7月1日	昭和11年9月23日	同上	31,321	92%	31,029	99%
1937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發行：臺灣時報發行所 印刷：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昭和12年7月1日	昭和12年10月22日	總督府內之高等官及其同等待遇者、判任官及其同等待遇者（不含巡查看守）、地方待遇職員、有給吏員、囑託員、雇員、各種委員會職員、州市會議會員及其他認為有掲載必要者。	34,456	92%	34,066	99%

西元	書名	印行者	調查時間	發行時間	凡例中載明的收錄範圍	系統收錄名錄	有本籍的比例	本籍補實名錄	本籍補實比例
1938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發行：臺灣時報發行所 印刷：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昭和13年 10月20日	總督府內之高等官及其同等待遇者、判任官及其同等待遇者（不含巡查看守）、地方待遇職員、各種委員會職員、州市會議會員、廳協議會員、有給吏員、囑託員、雇員及其他認為有掲載必要者。	38,098	91%	37,611	99%
1939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發行：臺灣時報發行所 印刷：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昭和14年 7月1日		同上	41,538	91%	40,957	99%
1940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發行：臺灣時報發行所 印刷：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昭和15年 7月1日	昭和15年 11月28日	同上	45,874	91%	45,158	98%
1941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發行：臺灣時報發行所 印刷：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昭和16年 7月1日	昭和16年 11月26日	同上	49,971	92%	49,162	98%
1942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發行：臺灣時報發行所 印刷：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昭和17年 11月1日	昭和18年 3月31日	同上	55,096	93%	54,425	99%
1943	職員錄	內閣印刷局	昭和18年 7月1日	昭和18年 9月30日	高等官及其同等待遇者	2,745	0%	2350	86%
1944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發行：臺灣時報發行所 印刷：株式會社臺灣新報社	昭和19年 1月1日	昭和19年 6月7日	同1938年	58,420	0%	39,296	67%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引用書目

《臺灣日日新報》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網址：<http://tais.ith.sinica.edu.tw/>。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網址：<http://who.ith.sinica.edu.tw/>。
国立公文書館，「国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網址：<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
国立国会図書館，「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網址：<http://dl.ndl.go.jp/>。

大藏省印刷局（編集）

- 1983 《官報百年のあゆみ》。東京：大藏省印刷局。

五谷昌平（編）

- 1913 《臺灣總督府警察職員錄（大正2月7月1日現在）》。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

卞鳳奎

- 2014 〈從《臺北市民住所錄 內地人ノ部》登錄簿來看日據時期鹿兒島縣人在臺北市的移民狀況〉，《臺北文獻（直字）》（臺北）190: 191-227。

- 2015 〈日本時期在基隆的沖繩縣人（1895-1943）〉，《臺北文獻（直字）》（臺北）194: 139-189。

日本警察新聞臺灣支局（編纂）

- 1931 《臺灣警察年代幹部職員錄》。東京：日本警察新聞社。

王明全

- 2011 〈日治時期「高雄州枋寮公學校」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麗蕉

- 2018 〈數位檔案系統在人文研究的應用：以總督府職員錄系統觀察臺灣女子公職發展〉，《圖資與檔案學刊》（臺北）10(1): 44-66。

王麗蕉、陳慧婷

- 2017 〈檔案編排描述與資訊系統研究回顧與展望〉，收於薛理桂、王麗蕉主編，《臺灣檔案學研究回顧暨書目彙編（1946-2016）》，頁73-105。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末武美佐

- 2011 〈沖繩籍教師與日治前期臺灣公學校教育（1898-1918）〉。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2011 〈日治前期臺灣公學校的沖繩籍教師（1895-1918）〉，《臺灣學研究》（新北）11: 59-85。

池田辰彰

- 2011 〈日本台灣統治時代初期宜蘭統治の研究〉。大阪：関西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論文。

- 2013 〈台湾総督府職員録から見た職員出身地と台湾人登用分析：明治36年から大正2年〉，《南島史学》（福岡）79/80: 108-125。

何憶如

2003 〈桃園縣新屋國小校史之研究(1905-2003)〉。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文星

1983 《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1 〈近十年來關於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研究之動向(1991-2000)〉，《臺灣師大歷史學報》(臺北) 29: 221-238。

李園會(編著)

2005 《日據時期臺灣初等教育制度》。臺北：國立編譯館。

岡本真希子

2008 《殖民地官僚の政治史：朝鮮・台湾総督府と帝国日本》。東京：三元社。

林婷嫻

2018 〈日記 boy、總督府職員錄，帶你穿越日治時期的臺灣〉，收於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編輯群，《研之有物：穿越古今！中研院的25堂人文公開課》，頁84-95。臺北：寶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林富士(主編)

2017 《「數位人文學」白皮書》。臺北：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

洪郁嫻

2004 〈日治時期「高雄第一公學校」之研究〉。臺南：臺南師範學院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胡博荳

2013 〈日治時期桃園龍潭公學校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說)

2004 《水竹居主人日記(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臺中縣文化局。

許佩賢

2014 〈臺灣教育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2011-2013年)〉，《師大臺灣史學報》(臺北) 7: 113-146。

許雪姬(總策畫)

2004 《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丘慧君(紀錄)

2003 《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思琪

2006 〈日據時期臺北地區初等教育之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彭煥勝

2009 〈近60年來臺灣教育史學發展的回顧與省思〉，《教育科學研究期刊》(臺北) 54(1): 1-21。

游鑑明

1993 〈日據時期公學校的臺籍女教師〉，收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輯，《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559-633。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

2002 《臺灣總督府》。臺北：前衛出版社。

翟芷萱

- 2012 〈日治時期高雄第三公學校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臺灣總督府

- 1909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明治 42 年 11 月）》。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 1920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 9 年 12 月）》。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學務課

- 1921 《臺灣總督府學事第十八年報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學務課。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 1906-1942 《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1-36。臺北：臺灣總督府。

- 1932 《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八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 1941、1943 《臺灣學事一覽》昭和 16、18 年度。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

- 1900 《（明治三十年度分）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第三篇》。東京：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

臺灣警察協會（編纂）

- 1917、1919、1920、1925、1930、1940 《臺灣總督府警察職員錄》。臺北：臺灣警察協會。

劉思吟

- 2013 〈臺北市萬華區日治時期初等教育學校之校園變遷〉。臺北：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

蔡牧耕

- 2014 〈日治時期朴子地區初等教育研究：以朴子公學校為例〉。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靜月

- 2015 〈日治時期苗栗山腳公學校之研究（1912-1945）〉。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鄭文棟

- 2018 〈日治時期公學校臺籍教師之薪資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謝佩錦

- 2005 〈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教師之研究〉。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謝清俊

- 2006 《謝清俊談人文與資訊》。臺北：數位典藏維運管理分項計畫。

Application of Taiwan Sotokufu Personnel Directory to Research in Humanities: Study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Li-chiao Wang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applying “Taiwan Sotokufu Personnel Directory” to research in humanities. Developed by Archives of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his Directory contains the staff records of the Taiwan Sotokufu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between 1896 and 1944. The 950,000 records in the Directory are unique, continuous and integral.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classification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digital records in the Directory to ensure accuracy of research. Changes in teacher composition and the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including primary schools, common schools, and *kokumin gakko*, were examined. Although application of the Directory has some limitations, the findings evidenced the usefulness of both value-added process and data mining technique for in-depth humanities research.

Keywords: Taiwan Sotokufu Personnel Directory,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ion,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Humanity Informatics